

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 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從敘事認同與 Karl Mannheim 關於世代研究的理論角度，探討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為何與如何形成特殊的回歸現實世代，分析其回歸現實理念與世代認同之關係。七〇年代初台灣的外交挫敗，使不同省籍的年輕知識份子廣泛覺醒，以中國近代國族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處境與自己這一代的責任，並批判流亡心態，呼籲回歸現實與社會政治改革。他們的世代認同鑲嵌在國族歷史敘事中：使其成為回歸現實世代的，是他們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尋求存在意義而積極實踐的結果。國族歷史敘事所形塑的世代認同，是特定社會變遷的產物，也是激發社會變遷的重要能動，它是一種歷史現象。「世代」是覺悟啟蒙的戰後知識份子用來理解自我、社會、與時代，並企圖改變現狀的概念範疇。研究這個關鍵世代的言論與活動，有助於了解晚近台灣文化、政治本土化或台灣化的長遠源頭與其他相關的歷史變遷。

關鍵詞：認同、敘事、世代、回歸現實、民族主義

Gener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Emergence of the “Back-to-Reality” Generation in 1970s Taiwan

A-chin Hsia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author uses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identity theory and Karl Mannheim’s theory of generation to a) analyze the emergence of a “back-to-reality” generation in 1970s Taiwan and b)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back-to-reality ideas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Taiwan’s major diplomatic failures in the early 1970s awakened young intellectuals (both Taiwanese natives and the children of mainland Chinese) to new challenges facing the country. They relied on a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t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make sense of the situation and to promote a sense of duty to the country among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eneration, attacking the prevailing sojourn mentality and supporting back-to-reality ideas and socio-political reforms. The author shows that the frame of reference for generational identity was a nationalist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in which intellectuals positioned themselves and struggled to make sense of their generation’s meaning of existence. Their attempts to act out their philosophy qualify them as Taiwan’s “back-to-reality” generation. I offer an analysis of how a generational identity shaped by a nationalist historical narrative evolved into a primary motivation for historical actors, noting that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a function of specific social change, which in turn became an agency that facilitated further social change. In this situation, generation--a conceptual category through which the awakening back-to-reality generation understood self and society and articulated its socio-political reformism--w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which subjective agency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ere of equal significance.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is generation’s discourses and actions as remote origins of the indigenization or Taiwa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Keywords: identity, narrative, generation, back-to-reality, nationalism

一、導言：問題緣起

一九七〇年代是戰後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關鍵時期。六〇、七〇年代之交，經濟起飛後的台灣面臨農村凋蔽、勞資糾紛、貧富不均等問題。七〇年代初嚴重的外交挫敗，強烈打擊國民黨政府。這些變化，迫使國民黨採取所謂「革新保台」政策，而此時也正值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階段。當時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理念與實踐則日漸發展。這個十年，後來被普遍認為是晚近政治、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啟動階段。

七〇年代啓發後續政治重大變遷的積極因素，不是威權統治者及其相當有限度自我調整的革新理念與作法。包括文化的明顯變遷在內，其積極因素都在於一股新的廣泛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它對既有體制的挑戰。這股力量主要來自當時大約 20 到 40 幾歲之間的「戰後世代」。他們不管是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幾乎都在戰後台灣成長，並在國民黨體制下接受教育。既有的研究，除極少數之外，幾乎沒注意到當時政治、文化變遷的這種世代的面向。¹

戰後出生的人口遽增，以及高等教育的顯著發展，在六〇年代後半期，造就了大量年輕知識階層。戰後世代做為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興起於「保衛釣魚台」運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 1971、1972 年期間。本文針對這段七〇年代初期的經驗，指出戰後世代在政治、文化變遷上的重要性，分析其「回歸現實」理念及改革主張與其世代認同、歷史敘事的密切關係。釣魚台主權爭議、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政治事件，是促成回歸現實世代出現的關鍵性、充要的歷史條件。在六〇年代普遍感到孤懸於歷史之外、與國族命運有所隔閡、對時局發展無能為力，而且感到迷茫抑鬱卻又孤絕自負的年輕一代知識份子，因受七〇年代初台灣重大外交挫敗的刺激，廣泛經歷

¹ 討論當時政治變遷與戰後世代關係的少數文獻，除蕭阿勤(2003)之外，見下文討論。在文化方面，則有蕭阿勤(2000, 2002)。

「覺醒」的過程。他們不分省籍背景，都憑藉一個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國族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的處境，並且定位自己這一代在其中的責任與使命。² 他們強烈反省批判上一代與以往自身的「流亡」心態，體悟到深入認識台灣社會、將自我與更廣大的外界現實聯繫起來的重要，積極要求社會政治改革。本文因此以「回歸現實世代」綜括指稱那些積極挑戰體制的活躍分子，以及有意識批判揚棄流亡漂泊心態的其他廣泛的年輕人。重大的傷痛事件(traumatic events)，是激發年輕世代產生強烈世代意識的主要因素。這類事件嚴重衝擊社會，使他們從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理解政治、文化現狀與其所屬世代的歷史位置，進而萌生批判意識與行動。在當代社會，如此具有形塑重要歷史行動者、引發社會變遷的世代意識，往往鑲嵌於國族歷史敘事。透過國族的歷史視野，積極參與、推動政治、文化變遷的年輕知識階層在時間洪流中自我定位、尋找意義。也因為如此，他們成為國族意識的核心承載者。

二、世代研究的概念與理論

(一) 台灣政治及文化研究與世代做為社會學的分析概念

對台灣晚近政治與文化變遷的既有研究，除了少數例外（見下文討論），極少關注到世代的面向。這些研究如果討論到七〇年代政治、文化變遷涉及的社會人群身分的分歧，大致都將重點放在省籍上（譬如王振寰 1989: 90-94；Tien 1993[1989]: 95-96；若林正丈 1994: 179-191；黃德福 1995: 9-11；Hood 1997: 62-64；Hughes 1997: 50-51）。³ 一些研究特別注意到年輕學生與知識份子在當時政治反對運動中，尤其是在七〇年代初廣泛政治抗議濫觴之時，扮演重要角色

2 關於這個敘事的要素，參見蕭阿勤（2000: 92，表一）的分析。

3 其中一些也論及階級因素（尤其是經濟發展後勞工與中產階級的角色），如Gold（1986: 90）、若林正丈（1994: 185-186）。

(如 Gold 1986: 93-94; 李筱峰 1987: 90-108, 117, 122)，但這些研究也不曾將世代當做分析的重點。七〇年代以來的政治發展過程中，尤其是 1977 年中壢事件、1979 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與支持者，主要都是本省人，省籍的確成為主要的社會分歧。但是七〇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後所興起對國民黨統治的批判與行動，事實上廣泛來自不同省籍與立場者。在理解這個時期的現象時，專注於省籍因素是不恰當的。當時外省籍人士批判國民黨統治，其數量之衆多與態度之激烈，不下於本省籍者（見下文討論）。如果專注於省籍，我們無法適當解釋這些現象。我們必須從世代——尤其是世代交替與衝突——的角度，去分析七〇年代初廣泛興起的政治社會抗議與改革主張，才能提出更符合歷史過程的解釋。

過去專門針對與人們年齡有關的台灣政治現象之研究，幾無例外，都集中在以量化調查方法，探討人口中不同年齡層者與政治有關的普遍經驗、態度與行為（譬如 Appleton 1970, 1973; 陳義彥 1978, 1991; Liu 1979; 陳文俊 1983, 1994, 1997, 1998; 張茂桂、蕭新煌 1987; 劉義周 1993, 1994; 朱全斌 1998; 吳乃德 1999; 陳陸輝 2000; 盛杏媛 2002; 蕭揚基 2002）。這些研究的重點多在釐清與政治變遷有關的民衆特質（譬如不同年齡者的投票行為與選舉結果的關係），或預測未來政治變遷可能的方向（譬如不同年齡者的政黨認同的未來影響）。對這些研究而言，年齡與性別、職業等同屬受訪者的客觀社會背景，而非具有激發社會行動潛能的主觀認同。它們關注的，不是處於特殊生命階段的少數人之獨特主張與行動，不在於探討世代意識如何成為社會政治的積極行動之能動(agency)來源，而這些則是本文研究取向的焦點所在。再者，量化調查研究，固然可以掌握民衆普遍的態度、行為與政治變遷可能的動向，但突發的重大事件與劇烈的社會動盪，往往出人意料；對於其過程與影響，以及對佔社會少數但卻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的群體或個人的活動，幾乎只能在事後追溯爬梳。對於戰後世代在七〇年代台灣變局中的角色、世代認同，以及所造就的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其性質即屬此類。在這樣異於量化調

查的研究取向中，就像 June Edmunds 與 Bryan S. Turner 卓有洞見所指出的，在歷史上，重大的傷痛事件往往創造了獨特的世代；以回顧的方式來概念化特殊的世代及其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是最適當的 (2002a: vii)。

對七〇年代初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戰後世代成員的言論與行動，少數文獻曾有詳盡紀錄。黃默(Huang 1976)基於當時對台大校園與《大學雜誌》等活動的參與觀察與訪談，提供了一個至今為止最詳盡的描述。雖然黃默以「年輕知識份子」(young intellectuals)統稱這些戰後世代成員，但對世代的面向沒有進一步討論與理論分析。陳鼓應的文章(1982a, b, c; Chen 1982)在討論七〇年代挑戰國民黨統治的戰後世代成員時，直接以「新生一代」稱呼。他以當事人身分討論其中涉及的世代交替與衝突，給後來的研究者多所啟發。陳鼓應的文章雖然比黃默的研究較具分析的部分，而且注意到世代與代溝問題，但兩者都僅僅將世代當做描述用語，而非分析的概念。他們的研究固然提供一個貼近歷史過程的詳細描繪，但後來的研究者如欲進一步從世代角度探討當時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則必須在理論分析上再加以提升精進。⁴

世代開始成爲當代社會學的有效分析概念，必須歸功於 Karl Mannheim 在 1920 年代末開拓性的長篇論文(Mannheim 1952[1927])。當代社會學探討與年齡有關的人群如何成爲社會變遷的能動者(agents)時，Mannheim 的概念與理論，仍然是重要的討論起點(Altbach and Laufer 1972; Laufer and Bengtson 1974: 182; Kertzner 1983: 127; Hardy and Waite 1997: 1, 18; Turner 1998, 1999: 246; Edmunds and Turner 2002a: 7-8; Scott 2000: 356)。Mannheim 認爲，世代概念在分析上的有效性，不在於指出人們在生物學上的年齡一致或相近，而在於說明他們如何因爲處於同一社會的特殊歷史過程，經歷類似的社會變遷力量，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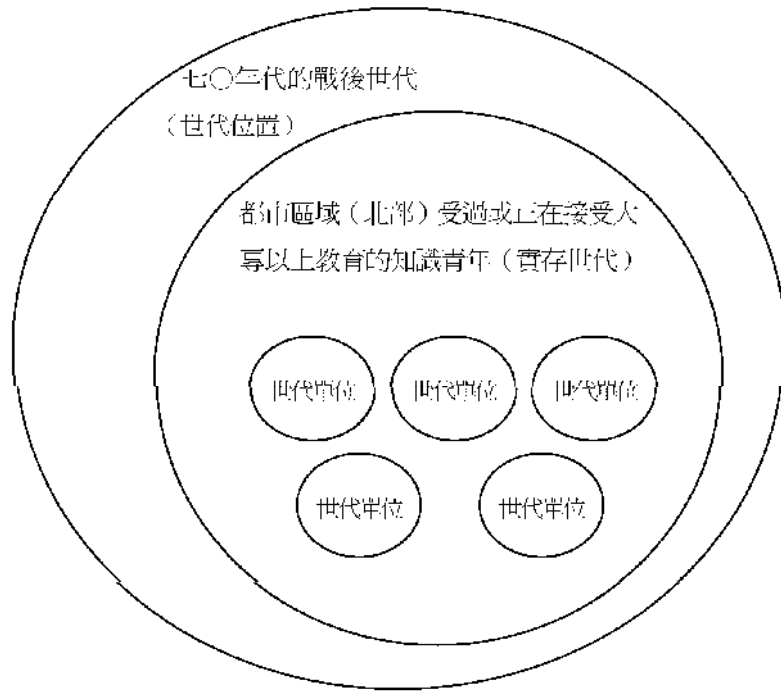
4 另外一位重要當事人洪三雄的著作(1993)，成書於九〇年代初，也詳細紀錄保釣運動後台大校園與《大學雜誌》等學生與知識份子籲求改革的活動過程，其性質類似黃、陳兩人之作。

在生活經驗與反應上有某種的共同性，並使他們異於其他世代。一群人年齡相近，至多只是他們共同社會行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特定世代要引發重大社會變遷，不會只是因為生存於同一時空，而必須是他們發展一種具有共同意識的連帶關係，足以激發他們參與共同的命運(Hardy and Waite 1997: 4)。其次，Mannheim 指出，世代因素成為人們共同社會行動的顯著基礎，經常是在社會變遷快速或社會政治動盪時期。在這種歷史階段推動社會、知識潮流的變化上，年輕的世代尤其扮演重要角色(Mannheim 1952[1927]: 286-287)。

從 Mannheim 的理論角度來看(1952[1927]: 297-298, 302-307)，七〇年代台灣的戰後世代明顯處於共同世代「位置」(location，亦即屬於同一歷史與文化地區、出生於同一時代者)。那些居住在都市區域——尤其是北部——而受過或正在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知識青年，普遍受到當時明顯的政治社會變遷的衝擊，以各種不同方式與程度體驗或參與了要求政治社會改革與回歸鄉土的潮流，感受這種新情境種種交錯的力量，因此可以說他們構成一個「實存世代」(a generation as an actuality; an actual generation)。在這些都市的知識青年中所出現的積極活躍分子，成為推動政治社會改革與回歸鄉土潮流的主力。他們的政治、文化主張即使不同，也都出於對時代變局的積極回應，因此構成這個實存世代中的一些核心，亦即Mannheim所謂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 (參見圖一)。本文的分析，正涉及 1971 到 1973 年左右一個特殊的實存世代、亦即回歸現實世代的開始形成，以及其中某些世代單位的雛形。

回歸現實世代的意識連帶與公共行動，為何不是以階級、省籍等基礎，而是以年齡相近的世代為基礎？⁵就階級來說，限於種種資料蒐集上的實際困難，我們不容易探查那些回歸現實世代的階級出身背景。不過由於許多社會文化因素，以及政治上國民黨肅清各種有「左傾」之嫌的知識學說與組織，戰後台灣整體而言，是一個民衆普遍缺

5 以下一段的討論，乃回應部份審查意見。筆者謹此感謝審查人之一的批評。



圖一 Karl Mannheim 概念下的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

乏階級意識的社會。⁶ 在這種環境中，不管這些回歸現實的年輕知識份子本身的階級身分如何，他們沒有以階級意識發展連帶感、甚至化為行動，大致上不難理解。至於族群方面，一些早期研究指出，雖然台灣六〇、七〇年代之交的本、外省籍大專生（也包括高中生）的社會交往對象明顯限於與自己相同省籍背景者，但他們對於許多政治議題的反應差異極小（譬如 Appleton 1970: 56; 1973: 759，註 12）。這顯示年輕世代成長於戰後台灣相同大環境的類似生活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減低省籍差異。年輕世代在政治上的相近反應，尤其反映國民黨關於國族認同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有相當明顯的同化效果。筆者先前的研究也指出，以本省籍戰後世代為主的七〇年代黨外人士，即

6 以勞工為例，一些文獻與研究都指出，從工業快速發展、就業機會激增的六〇年代至今，台灣勞工的勞動階級意識相當微弱（譬如楊青矗 1977；Gold 1986: 89；Gates 1992: 176, 183；Marsh 1996: 38, 242-244）。

使嚴詞批判國民黨統治，但他們內化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以中國人的主體位置思考省籍問題，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充滿期待（蕭阿勤 2003: 225）。就像許多民族主義研究指出的，現代學校正式教育對塑造國族認同特別重要。從二十世紀初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發軔以來，對照大陸時期的動盪不安，台灣的戰後世代是國民黨能在社會繁榮穩定中，透過學校正式教育充分教化其特定主體角度的中國國族認同的第一代人。對本省籍戰後世代而言，這使他們迥異於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父祖。⁷ 對外省籍的戰後世代來說，這也使他們異於成長於戰亂流徙中的先輩。回歸現實世代視七〇年代初台灣面對的變局為國族的危難，就此而言，使他們在變局中產生共同連帶感的最主要基礎，是他們都在戰後受國民黨體制教育，嫻熟於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因而具有鮮明的中國國族認同感。簡言之，戰後台灣生活與教育經驗對年輕一代的同化，使他們與上一代有所差距。這種集體的世代關係特質，是使回歸現實世代的意識連帶與公共行動以世代為基礎的重要因素。如下文討論所顯示的，在社會政治劇變中，戰後世代反思自我的處境與角色，對這種世代差異倍加敏感。

（二）傷痛事件與覺悟啟蒙，世代意識與歷史敘事

Mannheim 在 1927 年之後，不曾再延續世代的討論。社會學理論發展重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歐洲轉移到美國，而一直到六〇年代初至七〇年代初，美國工業社會發展引起種種問題與大規模青年學生抗議運動，才促使一些研究者運用類似 Mannheim 的世代概念來探討相關問題，尤其是積極行動的少數青年份子對同一年齡層以及對社會的廣泛影響。然而這類討論的概念運用通常相當寬鬆，缺乏像 Mannheim 的謹慎細緻。如此的發展趨勢，逐漸引起以量化取向研究人口老化與年齡團體的社會科學家之懷疑與不滿。不過就像 Robert S. Laufer 與 Vern L. Bengtson 在七〇年代中期指出的，這些繼起的量化取

7 1952 年出生的吳念真所導演的自傳性電影「多桑」（1994 年上映），藉著父親（多桑）與子女的衝突，描寫這種涉及國族認同的世代關係，既生動又深刻。

向的社會科學研究，普遍避開 Mannheim 世代概念中關於社會變遷的能動(agency-of-social-change)的意涵，放棄其積極的政治意義，而試圖將世代位置當做一個類似性別、種族、或宗教信仰的社會範疇來處理(Laufer and Bengtson 1974: 182-185)。Norman B. Ryder 的「出生口合」(birth cohort) (1965)與 Matilda White Riley 等人的「年齡階層化」(age stratification) (Riley et al. 1972)，正代表社會學在這方面的發展。這些社會學中關於不同口合成熟老化的社會過程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關係的思考，大致都可以納入後來以 Glen H. Elder Jr. 為主所發展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研究與理論(Elder 1974; Giele and Elder 1998; Hardy and Waite 1997: 7-8; Edmunds and Turner 2002b: 2)。自 Ryder 以來，這個取向注重特定口合整體成熟老化的社會模式，因此對特定年齡層人群中通常並非佔多數的意識形態團體與積極活躍份子——亦即 Mannheim 所謂的世代單位——不感興趣，同時也較排除 Mannheim 著作核心的社會衝突理論觀點(Laufer and Bengtson 1974: 185)。

另一種概念化世代的取向，也注重特定年齡層的人群，但由於更強調處於特殊歷史時期的人們，其世代概念往往涵蓋範圍廣泛而不僅限於單一的年齡口合。從這個觀點出發的研究者，經常以重大歷史事件來界定世代，而研究的對象往往就是特別深受這些事件影響的年輕人。更明確地說，這個取向是從世代的文化與政治的出現來理解特殊世代的社會形成，並且探討這種文化與意識的傳遞與變遷。形塑世代文化與政治的特殊歷史環境，要比一個口合的出生時間與年齡更重要(Kertzer 1983: 127; Edmunds and Turner 2002a: 6-7; Eyerman 2002: 52)。這個取向，普遍見於歷史學研究中（譬如 Tannenbaum 1976; Wohl 1979）。在社會學中，雖然 Mannheim 從知識社會學出發的世代理論將這個取向做更細緻的發展，但是在他之後，極少有社會學者追隨。對許多社會學家而言，Mannheim 的理論沒有提供世代現象的經驗研究準則。首先，在談到一個世代位置成員轉化為實存世代、甚至世代單位時，雖然 Mannheim 提到這經常發生在社會變遷快速或政治動盪時期的年輕世代上，但是個人實現這種轉變的機制是什麼，在其理論

中沒有進一步說明。其次，Mannheim 理論的另外一個關鍵部分，亦即形成一個實存世代所必需的世代意識，在經驗資料分析上究竟指什麼，也不清楚(Pilcher 1994: 492)。

對一些社會學家來說，正由於 Mannheim 在聯繫世代與社會變遷兩者的關係上，強調共同意識的重要性，反而使他的世代概念難以成為「能適合於科學方法的一個乾淨俐落的分析工具」(Hardy and Waite 1997: 5)。六〇年代中 Ryder 在以出生口合概念取代 Mannheim 的世代概念時，明白拋棄其世代位置與實存世代的區分，以及其世代意識的概念，認為在當代社會中，很難說一個口合整體有所謂的共同意識。但即使如此，他也承認在探討那些處於同時代而投身於藝術運動、政治運動等的少數群體時，共同的世代意識及其所激發的連帶感，是一個可以「帶來豐富成效的假設」(Ryder 1965: 855)。然而任何要承繼 Mannheim 分析取向的研究者，都必須面對經驗研究準則的問題。第一、Mannheim 理論的核心問題，乃世代如何因為共享經驗與共同世界觀的浮現而形成社會連帶與積極的行動意識。Molly Andrews 借重 Paulo Freire 對貧苦文盲或受壓迫者的教育學或教學方法(pedagogy)理論中的「覺悟啓蒙」或「覺醒」(conscientization)概念指出，一個世代位置成員要轉化為實存世代、甚至世代單位，必須經歷一種覺悟啓蒙的過程，亦即個人從宿命地認為無法改變生活現狀、充滿無力感，轉變為最終具有批判意識，覺得能夠積極有力地思考現狀、對現狀採取行動，而且從社會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來理解現狀。快速社會變遷固然會促使世代位置成員轉變為實存世代，但覺悟啓蒙才是實現這種轉變的機制(Andrews 2002: 78-80)。與實存世代的世代意識形成有關的劇烈社會變遷，往往是戰爭、內亂、流亡等歷史上令人傷痛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使人們產生時間斷裂或歷史分水嶺的感覺，覺得面臨共同的考驗(Wyatt 1993: 2)。屬於特殊世代位置的個人遭遇重大傷痛事件而經歷覺醒過程，才使他們由消極的「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一個自覺而積極的實存世代，或者 Richard G. Braungart 所謂的「歷史世代」

(historical generation)、Turner 所謂的「策略世代」(strategic generation)，並非消極接受既有文化，而是在客觀有利環境下，能創造出足以帶來重大社會變遷的強烈世代意識或政治變遷理念。他們的政治與文化理念與實踐，往往設定了後續世代在思考與行動上的參考架構與限制條件(Braungart 1984: 113-114; Turner 2002: 16)，就像回歸現實世代對晚近台灣政治、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影響一樣。七〇年代初戰後世代的普遍籲求，是晚近這個發展長遠（雖非直接）的源頭。

第二、屬於特殊世代位置的個人因為痛苦事件而覺悟啓蒙，往往與他們明顯積極地將自己定位在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中的轉變密切相關。個人對於世代位置的自覺，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政治行動主張，通常必須藉著說故事或敘事(narrative)的方式表達出來。從「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的理論角度來看(Somers and Gibson 1994: 64-73; Ringmar 1996: 73-78; 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 xix; Whitebrook 2001: 4, 9-10)，人們所訴說關於他們自己生命的故事與其認同密切相關，兩者之間相互構成、彼此建構。這些故事通常顯示他們如何回答「我（們）是誰？」、「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生活？」、「我（們）應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我（們）的生活目的與利益何在？」等一連串與自我存在、自我實現有關的問題。藉著訴說那些關於生命的故事、實踐故事中的暗示與期望，人們逐漸變成他們後來所呈現的樣子。不過個人有關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鑲嵌於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敘事，從後者取得主要的參考架構(Somers and Gibson 1994: 62, 74; 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 xxii-xxiii; Whitebrook 2001: 4, 6; Andrews 2002: 80, 84)。敘事形塑了世代認同，誠如 Andrews 所言：

所有生活在一個特定時刻的人們既建構故事，也被故事所建構。同時，故事一代一代傳下去；它們是文化認同的基本要素，而我們繼承自前人、流傳給後代的，就是這種基本要素。個人做為一個世代的成員，是透過這些故事，才能在歷

史過程中定位自己，而這麼做，個人才創造一個架構，這個架構使他們充分發揮推動真正改變的能力，有了最大的可能性。(Andrews 2002: 85)

近兩個世紀以來，由於現代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統治模式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與鞏固，使國家成為當代社會集體公共敘事的主要提供者。透過正式教育與各種社會教化管道傳布的國族歷史敘事，在當代人們集體認同建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台灣來說，七〇年代戰後世代因為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等傷痛事件而激發強烈的世代意識，而其世代意識的主要參考架構，是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主、關於近百年來中國國族命運的歷史敘事。七〇年代戰後世代不分省籍的世代意識，透過國族認同而傳遞、開展。其世代認同鑲嵌在國族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敘事中，是在國族提供的歷史敘事中具體成形，而其重要基礎是戰後普遍而相當成功的國族教育與教化。「回歸現實」的世代，並非自然出現而成為政治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承載者，而是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尋求存在意義而積極實踐的結果。本文分析的焦點是被國族歷史敘事所形塑的世代認同為何與如何成為特定階段重要歷史行動者的主要動力之一，亦即分析世代意識如何是特定社會變遷的產物，而同時又成為激發進一步社會變遷的重要能動之一。

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國族認同的研究，極少直接將重點放在世代上。⁸ 然而十九世紀初以來的世界史上，在動盪或劇變歷史階段做為社會政治革命性變遷的能動者的眾多青年世代，幾乎都涉及民族主義，也與其世代獨特的渴望及對父祖輩的挑戰有關。這些在關鍵時刻浮現的歷史世代或策略世代，往往成為日後國族意識與性格的奠基者 (Braungart 1984: 113-114; Edmunds and Turner: 2002a: 71-72)。吳乃德曾指出，就政治反對運動發展而言，在九〇年代末正值三十歲以下者，

8 例外之一，譬如 Elie Kedourie (1993[1960])的經典之作，尤其是 Chapter 5。

是在家庭生活的私領域習得對民進黨的認同。他強調社會與政治分歧顯著時期或政治體，個人在公領域激化形成的意識形態立場，似乎比家庭社會化更影響其政黨認同。而台灣「具有反體制意識形態的全國性反對勢力」，出現於七〇年代(1999: 55-56, 62, 78)。這個集體性質的政治異議與行動發展初始階段的主要領導者與追隨者，正是當時的戰後世代。我們可以說，七〇、八〇年代反對運動的擴大深化，與他們個人意識形態的確立定型，是互相激盪、互為因果的。⁹到了九〇年代以後，他們已成為吳乃德文章中所謂的中高年齡層，也成為政黨認同的重要傳遞者。研究這個關鍵世代的言論與活動，對於了解台灣社會晚近的歷史變遷，非常重要。限於篇幅與基於問題意識，本文僅探討 1971 至 1973 年間啓發社會政治異議與改革要求的核心戰後世代成員及其言行，而焦點則在於分析其回歸現實理念及實踐與歷史敘事、世代認同的關係。¹⁰

三、研究資料與方法

本文所依賴的主要研究資料，是紀錄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初相關現象的史料，包括當時與後來出版的報紙、雜誌、文集、論著、校園學生刊物等。其中對本文問題意識與分析焦點最重要的，是那些戰後世代表達對自我、社會、時代、國族及其關係之體驗與看法的言論。本文所針對的保釣運動後兩年左右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積極活躍分子，雖然不完全限於台大校園與《大學雜誌》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但

9 王甫昌曾指出，「戰後出生的世代的異議性政治意識，不是過去被壓抑的親身經驗在外在限制解除後的重新浮現，而是新近取得的態度。即使是親身經驗二二八事件的戰後第一代，現在所具有的異議性政治意識，也不是其過去個人親身經驗必然衍生的結果。」王甫昌強調，他們在九〇年代末的異議性政治意識，是反對運動領導者與支持者之間長期互動形成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八〇年代之後反對運動持續挑戰所造成的集體政治意識轉化的結果(1997: 254-255, 285)。

10 這樣的分析，是基於這兩年多期間不分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普遍發展回歸現實理念，並與其世代認同密切相關的事實，但沒有假設他們在其他政治、文化等理念完全一致，也並未假設 1973 年之後的戰後世代在政治文化主張上完全同質。不過基於本研究的問題意識，這些異質性，不是本文的分析重點所在。對於其異質性，一個經常被引用的描述為南方朔(1978)的系列文章。

他們構成這個社會力量的絕大部分。因此討論七〇年代初部分，本文主要圍繞在（但也不限於）與台大校園及《大學雜誌》有關的史料。在本文採取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中，這些資料構成文本(text)，亦即對人們溝通行動的言語或文字的紀錄。¹¹ 細密詳盡的文本爬梳整理工作，是論述分析的基礎(Fairclough 1995: 187; Barker and Galasiński 2001: 62)。

對於「論述」是什麼，研究者實無共識。本文採取社會建構論的論述分析立場：我們言論的方式並非中立地反映我們的世界、認同、與社會關係，而是在創造與改變它們上，扮演積極的角色。換句話說，語言不只是描述的工具與溝通的媒介（這是傳統看法），而且是社會實踐、「一種做事情的方式」(a way of doing things)。社會與心理研究針對的現象是「在論述中並透過論述而構成的」(constituted in and through discourse)。言談不斷構成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實，不只是簡單反映現實而已(Wood and Kroger 2000: 4; Philips and Jørgensen 2002: 1)。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在不同社會領域與經驗上，語言構成、創造、改變現實的作用力不等，亦即有相對地不屬於論述形式而難以用論述分析的社會成分（譬如經濟結構）。¹² 但本文的目的在於理解戰後世代如何體認自我、社會、時代、國族等，亦即他們自身與外在環境如何被經驗、被表現，以及與此相關的行動，則上述社會建構論的立場是適切的。這些現象，都關乎人們以言語文字與事物及行動的象徵價值來創造意義。

對於論述分析應如何蒐集資料與分析，研究者也無共識。論述分析的研究者通常將其方法論定位在詮釋學的(hermeneutic)傳統，而非分析的、演繹的(analytical-deductive)傳統，因此在其資料蒐集與分析之間，常無清楚界線(Meyer 2001: 25)。但無論如何，從資料蒐集開始，筆者與大多數論述分析者一樣，以類似 Barney G. Glaser 與 Anselm

11 這是在論述分析中較常見的定義。關於比這個更狹隘或寬鬆的文本定義及其利弊，可參見 Fairclough (1995: 4) 的討論。

12 參見游美惠(2000: 28-29)的討論。

L. Strauss開啓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方法進行：資料蒐集未必在分析開始之前就結束，而是蒐集初步資料後進行初步分析，尋找特殊概念的經驗性指標、擴充概念而成範疇(category)；依據這些初步結果，蒐集進一步資料，如此反覆在資料與概念、範疇間互相檢證比較（類似「理論性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的做法）(Meyer 2001: 23-24)。「流亡或漂泊心態」、「傷痛事件」、「覺悟啓蒙」、「世代認同」、「歷史敘事」、乃至於「回歸現實世代」等，都是本研究比較整理文本呈現的龐雜經驗現象而將其範疇化(categorizing)所得，或借自既有文獻而具有分析作用的重要概念範疇。

上述分析文本的過程，重點在於釐清其可能顯現的談論特定事物的規則化論述。但是論述分析的目的不止於此，而更在於釐清那些形塑論述、因而界定、建構、與製造人們知識對象的歷史、文化、政治等力量。進一步而言，論述分析焦點也在於社會文化等脈絡中相互溝通的語言使用者所達成或所欲達成的社會行動(Barker and Galasiński 2001: 63)。本研究正是對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初台灣戰後世代本身的世代論述——尤其是七〇年代初的回歸現實世代論述、形塑其論述的力量、以及其社會行動意涵的分析，而重點尤在於國族歷史敘事——做為以過去、現在、未來的序列來建構時局事件之意義的論述形式——與世代論述的交互作用。

四、六〇年代的戰後世代： 沈默消極的一代

探討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出現及其性質，必須先理解六〇年代戰後世代的一般情形，尤其是具有公共關懷的年輕知識份子在當時的成長經驗與感受。戰後新生代人口的大量增長，以及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在六〇年代——特別是後半葉——逐漸出現明顯的社會後果。大量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知識階層的出現，不管是學生或步入社會的青年，都逐漸引起政府與社會大眾的矚目與討論。六〇年代中期

之後，台灣社會關於人口膨脹、代溝問題、少年犯罪、青年就業、留學問題、人才外流等的輿論逐漸出現。這些都顯示戰後世代人口的成熟與新一代知識階層出現的效應。

（一）政治監控、體制化教育、與消極沈默的一代

在公共言論層次上，六〇年代的戰後世代對自己這一代所面對特殊問題的討論，一個較早的顯例，是 1961 年春，籍貫天津的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王洪鈞在《自由青年》雜誌發表〈如何使青年接上這一棒〉。文中直陳大學畢業者就業困難，多數青年一心只想到美國，而政府既缺乏輔導，社會上成年人也少有提拔，「不願交棒」（王洪鈞 1961: 7）。這篇文章引起廣泛的回應討論，其中包括當時 26 歲、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而剛從預備軍官役退伍的李敖所寫的〈老年人和棒子〉，刊載於同年底的《文星》雜誌上。隔年初在《文星》上發表一連串文章而引起所謂「中西文化論戰」的李敖，在這篇他投給《文星》的第一篇作品中引經據典，泛論老年人維護職位與利益、阻礙年輕人向上流動的保守心態。他悍然地宣稱：「我們不希罕裡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沈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根真正嶄新的棒子！」（李敖 1961: 9）。王洪鈞與李敖的文章，隨後在一些刊物與報紙上引起回應與討論，但大致在幾個月內也就逐漸消歇。

戰後世代之間，另一個與社會公共議題相關的熱烈公開討論，發生在上述世代與「接棒」問題討論後不到兩年。1963 年 5 月，一位美國來台留學生與一位台灣留學西德的學者在報端撰文批評中國社會，激使台灣大學學生發起「自覺運動」，呼籲青年提高公德心、摒棄自私（丘為君等 1979: 333-385；吳國棟 1979[?]）。這項行動獲得北部許多大專院校與中學的響應，黨營《中央日報》率先以社論支持，而其他報章雜誌也出現熱烈討論，但大約一個月之後也就逐漸平息。

就像世代與接棒問題的討論一樣，自覺運動呈現戰後世代的世代意識。這從運動中「不讓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與「我

們既不是憤怒的一代，也不是失落的一代，更不是頹廢的一代，我們是腳踏實地的一代！是醒決的一代！」等標語口號（殷穎 1979[?]: 362, 363），可以清楚反映出來。同時世代及接棒問題討論，與自覺運動類似，兩者涉及的世代意識都與國族敘事與認同密不可分。王洪鈞討論青年如何接棒，正將這個問題與反攻復國的重責大任相扣連（王洪鈞 1961: 7）。至於李敖，雖然〈老年人和棒子〉一文看似泛論，但在一年多之後回顧該文與後續在《文星》發表文章所引起的回應與論戰時，他堅定地宣稱，「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將回歸到憤怒的一代」；「他們的轉變成功之日，就是中國的前途開朗之時。救國建國是百年大計，他們的眼光不在這彈丸小島，他們的眼光是在光復大陸之後」（李敖 1963: 11）。至於在自覺運動中，學生在台大校園張貼的公開信，則激動地宣稱「我們願意看到我們這一代萎靡不振嗎？……我們誰不想有一個健全的社會，我們誰不想拍拍胸脯說一聲：『我是中國人！』同學們要驚醒自覺呀！」，以及「我們仍不能深思猛省，那麼垂五千年之久的中華民族，就真的沒有希望了」（殷穎 1979[?]: 362）。這種世代認同及自覺與國族敘事及認同無法分開的情形，更反映在後來運動的名稱演變成「中國青年自覺運動」，而被形容為「帶著民族主義色彩的道德運動」（吳國棟 1979[?]: 42, 44）。

與七〇年代受國際外交挫折激發的年輕人的世代意識與行動的轉變比較，上述六〇年代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與社會公共議題的公開討論，比較是個人的、零星而短暫的，未曾激發這個世代較普遍的政治社會行動。即使如自覺運動超越少數個人言論層次，具有自發的集體行動性質，也幾乎未涉及政治社會議題，不曾挑戰既有政治、社會體制。它在本質上也只限於「以個人實踐為本的，是平平凡凡的，不是轟轟烈烈的，要求的是個人塑造自己」的道德運動（吳國棟 1979[?]: 44）。就政治社會議題的言論關懷與行動參與而言，相較於七〇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六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毋寧是一個相當消極的自在世代。造成這種消極的最主要原因，是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對社會的嚴

密監控。對戰後世代成長的直接經驗更重要的，則是威權統治的社會監控透過訓導教育而深入校園。許多關切社會政治議題的戰後世代成員，從中學階段就體驗到一種壓制的恐怖氣氛。¹³ 嚴密的校園監控，加上嚴格體制化教育，尤其是 1968 年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前，從升學初中就開始的考試、補習教育，都讓戰後世代普遍充滿抑鬱沈悶的感受。¹⁴

在相當壓抑的政治控制與體制教育下，除了循著一般管道升學就業，或者成為李敖所說的「太保學生」之外（李敖 1961: 9），出國留學，進而謀職定居，是戰後世代生涯發展的一個重要出路。¹⁵ 就像自覺運動中戰後世代的自我批判所顯示，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初在公共言論上，充滿了對戰後世代「苦悶」、「消極」、「自私」、「沈默」、「沒有熱情」、「現實而無理想」、只追求個人成就而對社會、國家等公共議題缺乏興趣之類的形容與不滿。尤其是盛行的出國留學風氣，更被當成戰後世代上述特徵的表現。這種形容與不滿，同時出於戰後世代的自我批判與更年長世代的指責（譬如陳曉林 1968；葉洪生 1968；李祥枚 1968；葉廣海 1968；文壽 1968；張系國 1969: 11；王曉波 1969: 15；何秀煌 1970: 15；李學叡 1970: 1；王高 1970: 1；楊國樞 1972: 11；孫震 1972: 40；文榮光 1972: 224-225）。¹⁶

（二）無根失落、流亡心態、與國族敘事

然而戰後世代抑鬱苦悶的普遍感受，一個更廣大的理由，是國共對峙下做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政治前途未卜、命運懸宕，使具有公共關懷的知識階層普遍有一種不知往何處去、無所依歸的強烈感覺。七〇年代初推動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的主要人物之一的王曉波後來回顧歸納他們當時的感受是「客觀上沒有出路，主觀上思想苦悶」（王曉

13 譬如陳漳生(1971: 33)、陳鼓應(1971: 6)所提到的經驗。

14 譬如林本山(1969: 25)、劉容傑(1969: 23-24)所描述的感受。

15 譬如林本山(1969: 25)、厚道夫(1972: 84-85)所描述的經驗。

16 早期一些以外文出版的研究，曾有簡單的類似描述，如 Israel (1963: 10)、Mei (1963: 71-73)、Appleton (1970: 55-56, 1973: 759-760)、Gold (1986: 90-91)。

波 1979: 6)。這樣的形容，指的是關心社會政治公共事務的知識份子在政治威權統治下，沒有公共言論與行動實踐的自由。對這一類戰後世代知識份子而言，正如王曉波所言，出國留學與謀職定居，彷彿是重要的解脫（王曉波 1979: 6）。

1954年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防止台灣的赤化，但也限制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的行動。對外省人而言，羈留島上，有家歸不得，隨著時間的消逝，更覺鬱悶。王洪鈞在 1957 年 11 月《文星》創刊號上的一篇短文中，即直言台灣「精神上的低氣壓使我受不了」，而「什麼是自由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的低氣壓？首先要數到人心的苦悶、麻痺和逃避現實」（王洪鈞 1957: 24）。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則生動描述外省人流亡在台，期待反攻大陸，卻「由期待到焦急，由焦急到失望，由失望到消極」，茫然不知何去何從的普遍心境（王洪鈞 1963[?]: 14-15）。在流亡生活的消極茫然中，外省籍戰後世代的留學、進而移民，尤其是前往美國，經常成為其父母輩的寄託所在。¹⁷ 當時外省籍年輕人本身對這種現象的批判不少。¹⁸ 六〇年代在東海大學任教、六十幾歲的「新儒家」之一的徐復觀，也曾不假辭色地批判大陸流亡來台者的游移心態，認為是這種心態帶動了台灣過度的留學移民風氣，使整個社會，「都以自己的子弟的一走為快，一走為榮」（徐復觀 1971[1968]: 182-183）。一位年輕人則直率批評從大陸來台者由於與共產黨鬥爭的慘痛失敗經驗，因此他們「雖然在台灣高唱了二十多年的中興大業，但最不具中興信心的是他們」，同時也希望其子女逃離台灣、遠離政治是非。他認為「二十年來的留學熱潮就是這些人攪起來的。他們是失敗主義者，並且將其失敗主義的情緒傳播給他們下一代」（陳漳生 1971: 32）。

在這種國共對峙、受困於小島而前途迷茫不定的心理下，六〇年

17 參見外省籍的顏元叔（〈「在西方文化陰影下的台灣」座談會紀錄〉，《大學雜誌》12: 23, 1968 年 12 月）、呂俊甫(1969: 4)所描述的感受。

18 譬如葉洪生(1976[1972]: 3)、凌淑如(1977[1975]: 18)。丘宏達的批評則見〈「大學生與大學教育」座談會紀錄〉，《大學雜誌》(39: 9, 1971 年 3 月)。

代的知識階層普遍也有一種孤懸於歷史之外、對於時局發展無能為力的強烈感受。這種感覺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國民黨的制式歷史教育與出版控制，明顯地使他們對中國或台灣過去的歷史相當陌生。不論本、外省籍，他們一般只能依賴國民黨的固定說法來理解過去。同時戰後世代對於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知識與文化的嚮往，也相對使他們對國族歷史與命運產生隔閡。¹⁹ 他們也對自己所生長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相當陌生。和對於中國的歷史一樣，他們也只能依賴國民黨的固定說辭來理解台灣的過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經追隨林獻堂而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等活動的葉榮鐘，在六〇年代曾專心著述，完成了《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灣人物群像》等重要著作。他的女兒葉芸芸後來回憶說：

那段六十年代的歲月，我雖然常幫父親抄騰〔騰〕文稿而做為第一個讀者，與同年代的許多年輕人沒有兩樣，當時的我心理上面對著西方，對屬於自己的歷史並沒有多少興趣。回想起來，自己認真地想要獲得台灣的歷史知識，竟要遲延至離開島嶼故鄉之後了。（葉芸芸 2000: 11）

如果日本殖民時期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台灣政治菁英的後代尚且如此，那麼可以想見即使是本省籍的戰後世代，一般也對台灣歷史相當陌生而缺乏興趣，更遑論外省籍者。²⁰

孤懸於歷史之外、置身於時局現實發展邊緣而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心理，除了使當時戰後世代被視為苦悶消極、自私沈默之外，他們也普遍稱自己為「無根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迷失的一代」等（譬如李祥枚 1968；杜維明 1968: 6；陳少廷 1968: 4；陳曉林

19 參見外省籍的尉天驄(1978: 155-156)、本省籍的陳映真(1978: 174, 175)、陳國祥(1979: 11)的自我反省。

20 參見張系國(1969: 11)所描述的感受。

1968；葉洪生 1968；陳鼓應 1978[1971]: 2；朗星 1972: 61)。雖然這種普遍感受不限於外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但有如上述，這與大陸來台者的流亡經驗密切相關。本身是外省籍作家的張系國即曾指出：「無可諱言，1945年後遷來台灣的人，在開始時無法對台灣建立濃厚的鄉土情感，尤其以知識份子為甚。這無疑是無根感和失落感的一個來源」（張系國 1984[?]: 90）。

然而對中國與台灣歷史現實的陌生隔閡，並非意味著戰後世代缺乏「歷史感」。這種對歷史現實的陌生隔閡感，與學習自國族敘事而滋生的某種強烈的歷史感並存不悖。就外省籍戰後世代而言，那些在襁褓中隨親人逃難來台或在台出生者，可以說並無實際的流亡經驗。他們懷有強烈無根失落感的流亡心態，主要來自家庭中上一代的口耳相傳，以及戰後教育的國族歷史敘事。這種來自上一代與國族敘事教化的深重流亡感，可以稱之為一種「擬流亡心態」或「擬漂泊心態」。七〇年代中一位大學生在校刊上談到父母「心存漢社稷，夢想舊家山」對她影響深刻，使她慣常「瞪著身分證上的籍貫嚷著懷鄉」；沒去過故鄉，「照樣可以把『鄉愁四韻』唱得有板有眼」。她說：「我們不是還在等著反攻的號角一響，就要離開這個暫時歇腳的地方嗎？」（凌淑如 1977[1975]: 19）和這位作者年紀相仿的王復蘇，在七〇年代學生保釣運動後台大校園推動社會政治改革中，是重要學生領導者之一，也是「社會服務團」主要發起人。他也曾在班刊上流露這種擬流亡或擬漂泊的感受，感嘆「不曾摸過故鄉的大地，不曾見過故鄉的藍天，不曾吃過故鄉的白米，只能從地圖上去懷念，從影片上去遐思」的悲哀（王復蘇 1990[?]: 63）。

至於本省籍戰後世代也不免染有的那種家國飄零、迷茫悵惘的感受，更主要是內化戰後教育的國族歷史敘事的結果。由於本省籍年輕一代更沒有上一代人流離避難、渡海來台的實際經驗，他們的這種感受可稱之為「半擬流亡心態」或「半擬漂泊心態」。與外省籍者比較，他們的心態更缺乏實際經驗基礎。不管是本、外省籍，對戰後世代而言，流亡心態都涉及對於特定歷史敘事的接受。本省籍的張俊宏

曾經回顧他們所受的教育，都教化他們要做「五千年歷史的承繼者」與「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大國的所有者」，而「近代史的教育告訴他們需要恢復強國才能雪恥，他們也期待這些願望的實現……」（張景涵 1975: 10）。七〇年代中二十幾歲、就讀於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而被視為屬於國民黨「黨內的溫和改革路線」的朱雲漢（宋國誠 1978: 2），則反省他們那一代在聯考壓力下，歷史知識的接受是被動的；他們關於中國朝代治亂循環、外侮內亂的近百年、戰後國共內戰與隔海對峙等的歷史意識，是由中小學統一教科書培養出來，「效果雖未必一致，但無形中的影響力卻難以估計」（朱雲漢 1977: 181-182）。

（三）孤獨與苦悶，責任與理想

六〇年代的戰後世代知識階層虛懸於歷史之外的孤絕心態，又與當時流行的西方知識文化有某種偶遇的契合，因而更增強他們的這種感受。張系國在反省當時曾流行的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與其各自的宗師羅素和沙特對他那一代人的影響時說道：「這兩派思想或多或少都告訴了我們：知識分子是孤獨的，而且還該以孤獨為傲」、「我們多少都受到羅素或沙特的影響：我們喜歡強調知識份子的責任，我們喜歡強調知識份子的驕傲」（張系國 1968: 14-15）。不過就像張系國在同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這種混合著孤獨與驕傲、苦悶與責任的感受，不僅來自特殊西方思潮的強化，更來自「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思想」強調「經世濟民」的影響（張系國 1968: 15）。六〇年代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知識份子，普遍具有這種孤絕沈重的自我形象。²¹

六〇年代中期之前對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知識份子深具影響的《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正分別代表「以西方為標準」的政治改革與文化改革理念。對那些接受國民黨教育而理解中國近百年國族不幸命運的戰後世代成員來說，實踐西方政治及文化理念與承擔

21 參見七〇年代初保釣運動後提倡「開放學生運動」的陳鼓應的妻子對他的形容（湯鳳城 1978: 197-198）。

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使命是並行不悖的。1968年元月創刊出版的《大學雜誌》，事實上正延續《自由中國》與《文星》深受西方影響的政治改革與文化改革期望，同時更充分展現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戰後世代知識階層，以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使命自期而追求西方政治與文化理念實踐的熱情。《大學雜誌》的創辦者與主要作者等，幾乎都是戰後世代的知識青年。

在以早期《大學雜誌》為代表的六〇年代末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的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他們自身所屬階層普遍的孤絕心態，已經出現一些批判。就像上述六〇年代戰後世代對自己這一代的困境與社會公共議題之公開討論一樣，這些呼聲在當時也是零星而短暫的。在六〇年代末偶然出現的這些片段反省中，我們已可看到保釣運動後回歸現實世代的先聲。在其中，他們對自身所屬的知識階層隔絕於廣大社會與群眾，深感愧疚。對他們而言，工、農等大眾的生活經驗、感受、與命運，要比他們自身圍繞知識而開展的一切來得更具體真切，也更能代表廣大社會的真實面貌，亦即更符合社會的「現實」。他們認為，改革社會自然必須先貼近、了解這個現實。換句話說，他們的社會政治改革意識，與「回歸現實」的態度，實為一體兩面。對於出生、成長於台灣的戰後世代，不管省籍為何，台灣社會是他們最直接熟悉而可理解的現實。但是這種被理解的現實，不是俱足自在、不落言詮的事物，而是憑藉中國國族歷史敘事所掌握的現實，是「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所看到、屬於「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經驗、感受、與命運。²²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意識的戰後世代知識青年，毋寧是在台灣尋找中國特性(Chineseness)。如此的企圖，也就是努力地將自我與社會，及其相互的關聯，納入一個特定歷史敘事來理解的過程與結果。

除了上述六〇年代末偶然出現的零星反省之外，整體而言，六〇年代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期望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普遍兼具強烈的

22 譬如張系國(1968: 15)與在美國留學的劉容生於《大學雜誌》(7: 2, 1968年7月)上的讀者投書。

孤絕感與使命感。歸納來說，他們的孤絕感來自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亦即國民黨威權統治對校園與社會的監控，幾乎禁絕任何挑戰體制的公共參與，使知識階層缺乏實踐行動的管道，與大眾相當隔離。這種被迫置身於社會政治公共事務之外的情形，加上困居小島、前途迷茫的感覺，以及對中國、台灣歷史現實的相對隔閡，都使他們雖然置身於時局之中，但又有著旁觀者無可奈何的冷漠心態，彷彿孤懸於歷史之外。其次，其使命感則來自中國傳統的教化，以及家庭（尤其是外省籍者）或國民黨教育下對中國近百年國族命運所感到的國仇家恨。我們可以說，對那些具有公共關懷與改革期望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來說，其孤絕感與使命感實為一體兩面，亦即愈有使命感，在當時環境下則愈感孤絕；愈感孤絕，則愈益悲憤而使他們更覺虛懸的使命之偉大。但這種混合的感覺，由於形格勢禁，終歸使他們消極苦悶。²³

對照六〇年代西方、乃至於日本等地的青年學生運動，以及七〇年代台灣的回歸現實世代，那麼六〇年代台灣的戰後世代之所以是一個相當消極的自在世代，主要原因乃在於他們「不是國家建設的積極參與者」，「被遠遠地隔離在政治與社會的主軸之外」（張景涵 1969: 26；陳鼓應 1978[1971]: 2）。這種情形，不限於外省籍者。²⁴不過如此消極抑鬱的世代，就像當時金耀基談到在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孤獨感與無力感時所說的，雖然「客觀的條件冰凍了他們的熱情與理想」，但「他們對祖國的未來也毫不缺少遠景與希望。他們只是在等待，等待一個挑戰性的機會」；「這孤獨的一群是消極地在等待一個運會之產生，而未能積極地去推動一個歷史的運會」（金耀基 1969: 5）。從事後回顧的觀點來看，不管是對留美的、或是對在台灣的戰後世代來說，金耀基所謂的一個「挑戰性的機會」或「歷史的運會」，正是隨後就發生的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等事件。這些事件使台灣的戰後世代從一個消極的自在世代，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而在晚近三十年的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中扮演重要角色。

23 參見外省籍的葉洪生反省的生動描述(1971: 36)。

24 參見外省籍的張系國(1984[?]: 90-91)與劉大任(1970: 40)的反省感嘆。

五、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

1971年9月，台灣退出聯合國前夕，一位三十幾歲的外省籍歷史學者郭榮趙在《聯合報》上發表〈一個歷史工作者對時局的反省〉，強烈抨擊戰後二十幾年執政當局昧於台灣內外局勢變化而「以不變應萬變」的錯誤。提到台灣內部的變化時，他說：

二十年來，人口的增加和流動性的增大；工商業的繁榮和發達；國民所得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知識水準的提高；對外貿易的擴張、交通的發達和大眾傳播的發展；人才輩出、資本家的出現、新中產階級的產生；對美對日的門戶完全開放，大批留學生的回國，新思想新潮流的刺激，和政治意識的早熟……等等。那一項不是事實俱在，那一項不影響深遠！這些新發展，這些新的歷史因素，在在說明一個新的歷史潮流已經洶湧而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誕生。（郭榮趙 1971）（底線為原文的強調）

事實上就七〇年代重大政治、文化變遷來說，這個「新的時代」的誕生，不僅是郭榮趙所論列的那些社會結構性變化所致，更是同屬一個世代位置的成員「覺醒」的結果。這些成員遭逢令人痛苦、造成深刻心理創傷的重大事件後覺悟啟蒙，進而從一個特定歷史敘事所鋪陳的更大時間脈絡來理解現狀、界定自己與所屬世代的角色，並且有所行動。

（一）釣魚台事件與退出聯合國、學生與知識份子的覺醒

1969年底之後，台灣與日本開始發生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議。雖然國民黨政府與國內輿論不斷聲明中華民國政府擁有該列嶼的主權，但1970年9月，日本外務省正式宣稱該列嶼的領有權屬琉球，而美

國即將把琉球歸還日本，因此日本自然擁有該列嶼的主權。同時，美國國務院也發表對日本有利的聲明，指出該列嶼的主權屬於日本。這一年底，又發生沖繩警察拔除釣魚台列嶼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日本與琉球政府的巡邏艇在該列嶼附近驅逐台灣漁船的事件。在這期間，國內已有國民黨政府對此外交主權之爭的態度過於隱忍軟弱的批評。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也在此時開始發起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進行討論、宣傳、募捐、組織等活動，並於 1971 年 1 月與 4 月在美國幾個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在台灣，則到了 1971 年 4 月，以北部為主的大學生，也開始集會座談、校內遊行、上書政府、至美、日大使館抗議等保釣的行動。在這些行動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大學生，並且在 6 月中美國與日本簽署移轉琉球（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管轄權文件的同一日，發動上千人左右的校外示威遊行，並至美、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其他地方的幾所大學學生，也同時在校內遊行示威或發表書面抗議。不過此後隨著美日的簽約已定，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也就銷聲匿跡。

然而當學生的保釣運動衰歇之時，台灣又隨即面臨更嚴重的外交打擊。上述台大學生校外示威遊行後數月之內，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兩度訪問北京（1971 年 7 月與 10 月），宣佈尼克森總統將於翌年訪問大陸，暗示美國將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 10 月底，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入，承認其為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1972 年 2 月，尼克森正式訪問大陸，與中共簽訂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在公報中，雙方指出將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而中共則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王斯德、錢洪 1989: 333）。接著，在「上海聯合公報」發表後七個月，日本與中共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王斯德、錢洪 1989: 336）。

雖然保釣運動在兩個月左右就已消歇，但從發生釣魚台事件開始，以台大為主的青年學生就逐漸關切政治社會改革的議題。台大學

生對校園教育、社會政治問題的熱烈關懷與討論，「頃刻之間從冰凍中冒出來」，「造成了二十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新局面」（陳鼓應 1972: 69；陳明哲 1973[1972]: 73；洪三雄 1993: 56）。以《台大法言》、《大學新聞》、《代聯會訊》等為主的學生刊物，以及以「台灣大學法學院學生代表會」（法代會）、「台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代聯會）等為主的學生社團，從 1971 年秋開始發表言論或進行活動，要求校園與社會政治的改革。另一方面，已經發行三年的《大學雜誌》在 1970 年底進行改組，容納 60 幾位學術、政治、企業界具有社會政治改革意識的年輕一代為社務委員。1971 年元月起，《大學雜誌》呈現改組後積極呼籲改革的新風貌。三個多月之後，隨即發生學生的保釣運動。保釣運動後台灣遭受一連串外交挫折，人心危疑不安的兩年左右期間，《大學雜誌》成為台灣政治社會批判、要求改革的言論中心。綜合而言，這兩年期間，台灣社會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來自台大校園與《大學雜誌》，而兩者互相呼應。1971 年 11 月左右之後，台大要求改革的主要學生與《大學雜誌》核心人士的來往合作更密切。1972 年元月，《大學雜誌》第二次改組，85 位的國內社務委員中，涵蓋五位台大學生，即王杏慶、錢永祥、陳玲玉、王復蘇、與洪三雄。當時《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總編輯楊國樞、常務委員或編輯委員陳鼓應、張俊宏、許信良、包奕洪、張紹文等與擔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與擔任台大法言社長的洪三雄等人「往來頻繁、關係密切」，「建立了亦兄亦友的親密關係」（洪三雄 1993: 62, 137）。洪三雄曾以他自己主持的學生刊物為例，指出「《大學雜誌》的主張和《台大法言》的言論，其實是相互呼應的」，彼此啓示與鼓舞對方（洪三雄 1993: 138）。當時年輕一代本省籍的民意代表黃信介與康寧祥所領導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尚處於起始階段。激發台灣社會改革熱望的重心，毋寧更在圍繞於《大學雜誌》的學生與知識份子。

（二）省籍與社會政治改革要求

1971 到 1972 的兩年左右，台大校園內上述學生刊物與社團於校園改革方面，大致在抨擊並呼籲改革導師制度、上課點名規定、訓導管理教育、學生刊物審稿辦法等。這些要求，都圍繞在「教育獨立」與「大學民主化」兩個主題範圍（洪三雄 1993: 60-61, 83-90）。除此之外，他們更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1971 年 10 月 15 日）、「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1971 年 11 月 25 日）、「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1971 年 12 月 7 日）等活動，並發表相關的支持言論。從 1971 年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兩個月間，各項大型的國事座談會即多達一、二十個（陳鼓應 1972: 69）。《大學雜誌》的重要成員都曾參與這些活動，而它們也超越校園，直接挑戰國民黨統治體制而提出重大變革主張。至於在《大學雜誌》方面，這期間則除了由成員個人發表的言論之外，並且陸續刊出由他們聯名發表的〈給蔣經國先生的信〉、〈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國是諍言〉、〈國是九論〉等，呼籲國民黨政府進行大幅改革。

上述積極要求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涵蓋本、外省籍。啓發七〇年代社會政治改革力量的學生保釣運動，其核心推動者就包括不同省籍背景。以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台大學生為例，1971 年 4 月 20 日成立的「國立台灣大學學生保衛釣魚台委員會」的 15 位常務委員，²⁵ 以及該委員會在六月中發動的校外示威遊行（「六一七示威遊行」）指揮與工作幹部，²⁶ 都同時包括本、外省籍學生。又譬如台灣退出聯合國後，隨即在《大學雜誌》聯合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一文的 15 位本、外省籍知識青年，²⁷ 要求政府「以開明及謙和的態度與百姓

25 其中張晉城、洪三雄、陳立偉、林溫裕、莊錦生等是本省籍，而李大維、陳沛健、錢永祥、張台雄、馮浩彬等是外省籍。該委員會成立之前幾日，由校方集合學生班代表與社團負責人所召開的保釣座談會中，激烈發言主張成立保釣運動組織的學生，即包括本省籍的洪三雄、外省籍的錢永祥、王曉波（洪三雄 1993: 10-14）。這次的集會，直接促成該委員會的成立。

26 其中陳立偉、洪三雄等是本省籍，而張台雄、錢永祥、石元新、馮浩彬、王曉波、李大維等是外省籍。

27 其中洪三雄、王紘久（王拓）等是本省籍，而王杏慶、王復蘇、錢永祥、王曉波、邱立本、林小鵬等是外省籍。

共甘苦同患難」，「以鐵腕手段，制止資金外逃，嚴懲貪官污吏」，並呼籲知識青年「與一千四百萬同胞共存亡同生死」（王杏慶等 1971: 23）。同年 12 月初，23 位台大、政治大學、師範大學學生社團負責人在台北報端發表〈我們的呼籲〉一文，呼籲青年覺醒自強、全民參與政治，並要求政府改革行政、維護國權獨立完整。這些學生也同時包括本、外省籍。²⁸ 另外，《大學雜誌》數十位社務委員原本即涵蓋不同省籍，其中核心的常委與編委即呈現這種特色。²⁹ 以「建國六十週年紀念」為名在台灣退出聯合國前夕發表在該雜誌的〈國是諍言〉一文，共同署名的 15 位人士，³⁰ 以及 1972 年元月發表的〈國是九論〉所署名的 19 位人士等，³¹ 也是如此。

事實上，從六〇到七〇年代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批評，整體而言，不管是六〇年代較為零星偶見的，或七〇年代相當普遍常見者，其中外省籍戰後世代對國民黨統治的批判，其疾言厲色或嘲諷揶揄，並不亞於本省籍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情形，大抵由於他們有著本省籍戰後世代所沒有的家庭經驗。外省籍戰後世代深受上一代離鄉背井、漂泊渡海的慘痛經驗影響，而有著更切身的國仇家恨感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大致也由於本省籍戰後世代的國語文運用能力一般而言尚不及外省籍者，而當時的公共言論與媒體也主要是外省人擅場的天地。³² 上述六〇年代首開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的公開討論而扮演重要角色的王洪鈞、李敖等人，正都是外省籍年輕一代。他

28 其中洪三雄、黃慶豐、吳燦輝、陳陽德等是本省籍，而王杏慶、王復蘇、李慶華、孟玄、馬英九、袁光亞、鄭安國、錢永祥等是外省籍。

29 其中陳少廷、陳達弘、張俊宏、張襄玉、羅傳地、陳鼓應是本省籍，而丘宏達、何步正、林抱石、張紹文、楊國樞、張系國等是外省籍。

30 其中張景涵（張俊宏）、陳鼓應、許仁真（許信良）、陳少廷、蘇俊雄是本省籍，而高準、包青天（包奕洪）、楊國樞、丘宏達、呂俊甫、吳大中、金神保、孫震、張尚德、張紹文是外省籍。

31 其中林正弘、陳少廷、陳陽德、陳鼓應、張景涵（張俊宏）、許信良等是本省籍，而王文興、包青天（包奕洪）、呂俊甫、吳大中、金神保、高準、張尚德、張紹文、張潤書、楊國樞等是外省籍。

32 1977 年時擔任立法委員的康寧祥替張俊宏的《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一書寫序時，以張俊宏為例，談到「我們的子弟又經過三十年的『民族訓練』，國語說得比外省人標準，文章寫得比外省人精闢，怎不讓備極辛酸痛苦的父兄，感到驕傲和雀躍呢？」（康寧祥 1977: 9）。康寧祥特別提出這點，反映的正是七〇年代之前本省籍年輕一代的國語文能力的限制。

們在反省自身困境時所表達對於上一代的不滿，事實上也反映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抗議，因為這個政權代表上一代歷史經驗與價值觀，並且塑造他們這一代的成長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六〇年代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的公開討論，主要反映的，是外省人內部的世代衝突。李敖於發表〈老年人和棒子〉一文的一年多之後，在另一篇自剖性文章〈十三年和十三月〉中回顧 14 歲來台後 13 年的成長歷程時，即忿忿地強調他對上一代的所作所為已「失望透頂」，而年輕一代的「缺乏營養與氣魄」是戰亂流離的後果，必須由失敗的上一代來負責。對李敖來說，這一代青年人有自己的遠景和抱負，「有他們現代化中國的藍圖」（李敖 1963: 10, 11）。

外省人內部的這種世代衝突，與國共內戰、國民黨政權的命運、外省籍戰後世代的國族認同，以及戰後世代藉國族歷史敘事而對自己所屬世代的定位密切相關。這種與國仇家恨相關的世代衝突，實為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歷史過程的一個結果與效應。尤其在七〇年代初以來危疑不安的時局中，外省年輕一代成員更有著從大陸來到小島，若再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深重危機感。台灣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對他們而言，有如國族與家族再一次面臨存亡決續關頭。對於帶給上一代悲慘遭遇，使他們這一代抑鬱寡歡，而又在此時使國民蒙羞、坐困愁城的政權，外省籍戰後世代似乎更難以隱忍。就像一位 30 幾歲的外省青年，自承 14 歲隨政府來台，「政府又何異於一己之衣食父母」，因此向來不願批評政府。但在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也覺得不得不一吐為快，疾呼「內政必須立即革新、全面革新，不革新不足以圖存」（張宏遠 1971: 18）。從下文的討論也可看出，當時外省籍戰後世代對時局的焦慮與批判國民黨統治，並不亞於本省籍者。

（三）覺悟啟蒙、世代認同、與國族敘事

從 Mannheim 的概念來看，上述積極要求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是從七〇年代初受到台灣政治變局的傷痛事件衝擊而敏銳地有所覺悟啟蒙的實存世代中浮現出來的世代單位。他們積極地對社會國家有所

主張與行動，雖然彼此的理念未必完全相同，但都是一個自為世代的核心理員。就七〇年代初不分省籍而普遍提出的改革言論來說，激發戰後世代的要求與熱望的核心要素，是與其國族認同密不可分、而且跨越省籍界線的世代認同。這種覺醒，使他們擺脫六〇年代戰後世代的消極抑鬱、孤獨苦悶、與無力感，開始積極地從社會更大的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來理解現狀，發展鮮明的批判意識，進而對現狀採取行動。如同前述，覺悟啟蒙而來的批判意識、世代認同、以及相關的社會政治行動主張，往往與這個世代成員積極地將自己定位在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中的轉變密切相關，亦即與他們如何在一個歷史敘事中積極地定位自己所屬的世代、並與過去及未來相連有關。³³ 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當時剛畢業於台大森林學研究所的王杏慶，自認堅持中國書生的傳統，在這岌岌可危之時，無法擺脫對家庭、國家及人民的責任，因此放棄原來留學美國的計畫（王杏慶 1971a: 57）。他的這個決定，曾經引起社會相當的矚目與討論。一位台大學生認為，王杏慶的選擇「反映當代台灣青年學生的歷史已開展到一個劃時代階段」，而這個階段，正介於六〇、七〇年代之間。他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覺悟，覺悟我們自己作為一種歷史的主體而在歷史脈絡中所佔的位置，一種前前後後相連關係的覺悟」（卡爾 1973[1971]: 47-48）。

戰後世代在覺醒中積極定位自己所屬世代時所憑藉的歷史故事，具體而言，就是關於中國近百年命運的國族敘事。就像六〇年代接棒問題的討論與自覺運動中世代認同與國族敘事及認同緊密相連一樣，他們將自己所屬的世代放到一個關於中國近百年來悲慘命運的國族歷史故事情節中，感受那成為國族共同體的光榮與哀戚，也體悟到自己的責任與使命。他們在覺悟啟蒙中萌生的批判意識，實與其積極地從更廣大的國族歷史來思考現狀與行動密切相關，而這始於釣魚台主權爭議事件的衝擊，接著則是由於台灣退出聯合國的震撼。在上述 1971 年 6 月學生保釣示威遊行中散發的〈告全國同胞書〉如此呼籲：

33 參見一位台大學生在迂迴地回應國民黨對當時學生與知識份子改革批判熱潮的疑懼時所陳述的話（陳明哲 1973[1972]: 75）。

一百二十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使我們欲哭無淚。我們也知道這不是該哭的時候，我們必須忍著淚把所有的侵略者擊敗，光復大陸，重整山河，才是我們哭祭黃陵的時候！（茅漢 1971: 25）

《大學雜誌》的編委會則激憤地指出，美日協定將釣魚台列嶼併同琉球群島管轄權移轉給日本，是「現代中國的嚴重外侮」。起草上述〈告全國同胞書〉的台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王曉波談到他們的感受時說：「『國家』『民族』在平時覺得是那麼遙遠和空洞的名詞，卻因釣魚台事件而來的一連串國恥，使同學們覺得『國家』『民族』是這麼的親和和真實。這是國恥！」（茅漢 1971: 24）。當時就讀於台大法律系的馬英九，後來則回憶說「〔保釣〕運動風起雲湧後，國家在青年心目中就變成有血有肉的實體，不再抽象了！」（王渡 2002: 129）。《台大青年》中的一篇文章則說保釣運動使他們體認到做為中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必須承擔民族的苦難，也體悟到他們並不是「無根的一代」，他們的根「就是這個苦難的中國」。³⁴在台灣退出聯合國前後剛從軍中退伍、本省籍的國民黨員何文振，則談到當時他與許多人的心情在煩悶之外，「隱隱約約都有一個共同的吶喊——改革自強，救國於危難之秋！」（何文振 1971: 25）。

對於保釣運動後以台大學生為主，熱心關切政治社會改革的現象，《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以《台大法言》為「這一代大學生覺醒的標誌」，認為這份學生刊物「承繼了中國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陳少廷 1973: 2）。我們可以說，台灣外交的連續挫敗，使七〇年代年輕知識份子突破以往對中國與台灣歷史現實的陌生隔閡感。親身經歷重大歷史事件所造成的切身之痛，使他們源自國族敘事的歷史認知與認同，變得無比真切。

34 原文〈為保衛釣魚台運動說幾句話〉，後來刊於《大學雜誌》43: 28-31（1971年7月），引文見其中第31頁。

(四) 世代差異、自我謳歌、與民主信仰

覺醒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的積極昂揚姿態，明顯表現在他們界定自己所屬世代與上一代差別的方式。對照上述六〇年代幾乎以外省籍戰後世代為主而對其上一代的批判，《大學雜誌》在 1971 年 7 月開始發表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或許是戰後對本省籍年長世代在國民黨統治下心態最早的公開討論。這篇使國民黨當局與知識階層相當震撼的文章，如此形容本省籍上一代的知識階層：

他們的年齡大致在五十五歲以上，受過完整的日式教育，由於現實社會少有他們可以扮演的角色，使他們終日生活在回憶之中，雖然偶而也嘗嚮慕日本今日的繁華，然而他們安份守己而守法，成為政府一群「冷漠的觀眾」，只有當偶而聽到有人批評他們接受「奴化教育」時，他們才會激起無名的怒火，然後迅速又歸於無可奈何的沈默。他們有相當良好的日本語言做為工具，但又不能用它來作他們發言的工具，由於始終默默無言，他們又成了被整個社會遺忘的一群。（包青天等 1971a: 33-34）（底線為原文的強調）

當時三十幾歲、外省籍的高準，是《大學雜誌》上〈國是諍言〉的執筆與連署人之一（高準 1978: 5）。他在一篇暢論台灣社會革新之道的長文中指出，「台灣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之一是戰前與戰後成長者之間，亦即「人數較少的老中代與數量龐大的青壯代之間」的「代間矛盾」。談到外省籍握有政治權力的年長世代時則說：

在台灣，上了年紀的老一代，尤其是當權派的老一代，往往由於自命老資格、老革命，而固[故]步自封，他們的思想觀念往往不但停滯在五十年代以前，而且還有些甚至停在二十年代甚至一十年代的，以致與壯青代的往往難於溝通……至於大約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的中一代，由於亦成長於五

十年代初期以前……與老一代雖然也有若干矛盾而大致上較能合拍。……大約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一代及二十五歲以下的青一代則由於共同成長於五十年代以來的台灣社會，而且又都是非當權者，都是比較上的無資本者，所以其思想觀念就較能溝通而共同與老、中代構成了相對的矛盾面。
(高準 1975a: 80)

相對於上一代，覺醒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顯得積極奮進，而相當自覺地要揚棄年長本省籍知識階層的沈默旁觀，或是年長外省籍權力階層的自以為是，以及兩者共同的對過去之沈湎耽溺。高準認為，戰後成長的「壯青代」，以及少數「觀念能與時俱進的老中代」，「不論『本省』『外省』，又共同構成了急欲尋求較好境界的另一個共同面」(高準 1975a: 81)。這種情形，也像〈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作者的描繪一樣。由於生於安定，未經戰亂，他們認為自己所屬的這一代知識青年「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感」，比上一代更為純真無拘束，而「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這是這代青年心靈上的基本特徵」(包青天等 1971b: 14)。

橫跨整個七〇年代，在那些覺醒奮起而以言論、甚至行動挑戰現狀、積極關懷政治社會事務的戰後世代成員之間，充滿了類似上述姿態昂揚的自我謳歌與期許。對他們而言，自己所屬的世代不但與父母輩的生活經歷與價值觀念相當不同，「也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代的青年迥異」。他們認為自己這一代青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安定環境中成長的新生代，接受比上一代完整良好的教育，是「求新求變」、「純真無拘束」、「能自由思考」、「真誠而實際」、「富有世界性觀念」、「有恢弘的胸襟與抱負」、「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迎向二十一世紀的第一代」等(譬如李少儀、陳景安 1972: 57-58; 陳鼓應 1972: 70; 台大大學新聞社 1972[?]: a: 22; 張俊宏 1977: 6-12; 胡晴羽 1977: 56; 吳豐山 1978: 144, 158, 209; 黃宗文 1978: 7-8; 南方朔 1979: 2; 朱雲漢 1980[1979]: 423, 426)。

這樣一個對政治現狀不滿、普遍挑戰國民黨統治體制的年輕世代，是國民黨統治下教育本身的產物。戰後的國民黨政權依附於美國，宣稱屬於冷戰中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陣營。在戰後各級教育內容中，關於自由民主價值與政治制度的介紹與讚頌，對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理念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影響。〈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作者就指出，「由於現行教育制度的內容有一大部份是屬於西方式的」，加上各種媒體上所見的西方世界，使得為數龐大的知識青年在步出校門後，「所看到本國的一切典章制度與種種落伍的現實形態卻與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完全隔閡，內心裏形成一道難以彌補的差距」（包青天等 1971b: 14）。陳鼓應描述他們那一代年輕人的經驗時則說：

二十年來辦了那麼多的學校，使太多的青年接受著高等教育，教育所畫給他們看到的是完美富裕的現代國家，清廉而高效能的政府，道德和正義伸張的社會，然而他們出了校門課室以後所看到的，卻是與畫面距離得過度遙遠的現實。除非「修改」教育所繪製的美麗畫面，否則只有「修改」現實來遷就青年們所追求的理想畫面。（陳鼓應 1972: 68-69）

對戰後世代成員來說，在安定中接受的自由民主思想，甚至是他們與上一代衝突的核心所在。那些要求校園與政治改革的學生認為他們自己成長於安定繁榮中，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普遍要求更大自由與擔當更大責任；上一代則生於憂患，痛苦的經驗使其對自由有所戒心，而這是「造成二代之間最大差距的原因」（台大新聞社 1972[?]: 22）。

正是基於上述單純的民主信仰而要求自由參與社會政治公共事務，使陳鼓應在 1971 年 11 月台大學生舉辦的「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中，不計後果地提出一項對國民黨統治相當敏感的呼籲：「開放學生運動」。對他而言，「民主精神在於大眾的參與」，學生運動「不過是意見參與的活動」；既是自覺運動、革新運動，也是愛國運

動（陳鼓應 1972[1971]: 64, 67）。綜觀整個七〇年代，民主信仰是他們界定自己世代特色的要素，而如此的信念也成為他們勇於挑戰統治現狀的一大動力。對那些在國族歷史敘事中確認自己生存意義而奮起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年輕人而言，追求落實的民主體制與生活，既是這一代人的、也是國家民族無庸置疑的行動目標。如此明確的世代的與國族的使命，迥異於六〇年代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的高蹈虛懸，而有著參與歷史、改造歷史的積極感。戰後國民黨體制教育充滿政治上的馴化壓抑，但就其傳播民主理念的教育內容來看，則國民黨政權無異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而這些掘墓人普遍醒覺而開始有所行動，就在七〇年代。

（五）革新、民主、與回歸現實

七〇年代覺悟啓蒙的「回歸現實世代」與六〇年代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另外一個主要的不同，是強烈的回歸台灣社會現實的理念。六〇年代的世代與接棒問題討論與自覺運動中，那些熱切討論自己這一代困境與相關社會公共議題的戰後世代成員的世代意識，固然與國族敘事及認同密不可分。他們對中國近百年國恥的歷史認知，形塑他們對上一代的質疑、對自己這一代的批判與社會責任的定位。但是戰後世代對中國、也對台灣的歷史現實都相當隔閡，加上威權統治、國共對峙、與冷戰的世局，使他們有著孤懸於歷史之外、置身於時局現實發展邊緣的失落、無根、與無力感。然而七〇年代畢竟已不同於六〇年代。歷經釣魚台主權爭議事件、美國與中共的友好接觸、退出聯合國等重大傷痛事件後，學生與知識份子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基本精神與出發點，就是回歸台灣社會現實。以學生而言，1971年秋台大學生開始發表言論或進行活動時，準備競選代聯會主席的王復蘇呼籲學生「了解學校的行政、督促學校的行政」，並且「影響社會，移風轉俗」（王復蘇 1973[1971]: 133）。法代會主席洪三雄則呼籲學生「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在現實環境中去革命怪現狀，去爭取新氣象」（洪三雄 1973[1971]: 135-136）。這些是學生方面回歸現實精

神的先聲。其中「對學校開刀」呼籲，逐漸擴散到政大、中央大學、中國文化學院等（南方朔 1978: 47）。就社會政治改革來說，回歸現實在於要求國民黨當局正視統治範圍限於台灣一島的事實，力行內政革新。同年 10 月台灣退出聯合國，《大學新聞》的一篇社論如此呼籲：

不管我們所擁有的土地有多少，起碼我們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是屬於共患難的一群人。大陸未復之前我們只有同心在此建立一個真正民主憲政體制的開化國家，然後再談其他期遠之途，才不致本末倒置而無所措手足。（台大大學新聞社 1972[?]b: 29, 30）

明確地說，這是《台大法言》上的文章所主張在台灣革新自強的「建國優先論」與「民主至上說」（程放 1973[1972]a；1973[1972]b），亦即其社論所認為的「建國者根本也，欲行反攻必先建國，此乃本末之序，是以惟其在九州未復之際先在自由地區徹底實踐民主憲政為民意政治、責任政治之實，用作反攻的本錢」。³⁵ 這種社會政治改革上回歸現實的精神，與《大學雜誌》成員在〈國是諍言〉中的主張一致。張俊宏等人直陳「二十年來我們在內部問題上不夠面對現實」，明白主張「我們不必為目前能力所不能達到的事投擲過多的時間與心思，實現中國的統一是我們最大的理想與奮鬥的目標，然而目前我們所急切要做的是：如何把台灣搞好」（張景涵等 1971: 1）。

外交連續重大挫敗的刺激，使學生與知識份子普遍深感家國動盪飄搖，而有「榮辱與共生死同之的意識與感覺」（洪三雄編 1973: 5）。回歸現實、要求內政革新，正是體認到同舟一命，並進一步深刻醒悟到必須關懷自己在其中生長而熟悉的土地。聯合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一文的 15 位本、外省籍在學與甫離校門的知識青年，

35 〈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台大法言》14 期（1971 年 11 月 15 日），見洪三雄編（1973: 1-2）。

開宗明義談到他們「自覺受育於斯，受食於斯」，對台灣這塊土地，「有血肉相連的親切和感情」（王杏慶等 1971: 23）。對外省籍年輕一代而言，回歸現實尤其意味著揚棄以往的「擬流亡心態」或「擬漂泊心態」。台灣退出聯合國時，葉洪生諷刺地說：「記得從前有人把我們比喻作『夢鄉國』，這的確不假！遷台後，我們靠著點祖傳密〔秘〕方，竟『一睡能排萬慮空』，怡然作了二十年春秋大夢，不可不謂奇跡！」（1971: 34）。高準則談到他也關心大陸的人民與土地，「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我沒有生活過，而要認識任何事物，除生活在那個環境中，是難於真正洞悉的。」對他而言，台灣與大陸之間已有巨大的「文化矛盾」。他說：「然余既生為中華民國之人民，自八歲抵台灣，生平絕大部分時間在台灣渡過，是以不能不熱切的關懷台灣的人民與社會，盼望它能進入較好的境地」（高準 1975b: 34）。王杏慶在放棄出國留學後，也誠摯地說道：「我是個出生在大陸，成長在台省的中國人。對於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和人民有著無比的感受和熱愛」（王杏慶 1971b: 58）。熱心參與台大學生保釣運動、連署〈我們的呼籲〉一文的馬英九，曾經回憶指出，保釣運動對台灣島內的知識份子而言，是一種「本土的省思運動」（王渡 2002: 129）。後來留美期間，馬英九曾擔任親國民黨留學生組織「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愛盟」）刊物《波士頓通訊》主編。由美返國前夕，他則如此說道：

我常想，我們這一代，既不是「失落的一代」，也不是「無根的一代」，而應是「反哺的一代」。我們上一代把青春埋葬在連年的烽火中，才使我們卅年來享受到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承平與繁榮。對於台灣這個母社會，我們虧欠得實在太多了，任何一個在台灣生長的人都應該時時以反哺為念。（馬英九 1982[1981]: 357）

總之，不管是對本省或外省籍的戰後世代而言，回歸現實是對家

庭與／或學校教育教化而來、缺乏實際生活經驗基礎的擬流亡、擬漂泊心態，或半擬流亡、半擬漂泊心態的反省與批判。本文稱七〇年代覺悟啓蒙的戰後世代為「回歸現實」的世代，正基於他們普遍廣泛地對這種流亡漂泊心態有意識的批判揚棄。

保釣運動後普遍出現的回歸現實呼聲，也充滿對工、農等大眾的關懷，以及想要了解他們生活現實的急切企圖。這種關懷與企圖化為實際，始於台灣退出聯合國後，台大主張改革的學生王杏慶、代聯會主席王復蘇等的推動（王復蘇 1972: 62）。他們與政大、師大學生社團負責人聯絡、交換意見，並且於 1971 年 12 月初在報端聯名發表〈我們的呼籲〉一文，呼籲「這一代的青年朋友們，要勇敢的走出封閉的自我世界，擁抱國家和人民」（王杏慶等 1979[1971]: 844）。文章發表後，他們隨即付諸實踐，其中以台大學生的行動最受社會矚目。王復蘇等人於是組織「社會服務團」，由一百五十多位學生開始調查農村、都市貧民、勞工、警民關係、選舉等問題。當時王復蘇談到該組織成立始末時指出，許多青年學生經歷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後，憬悟到校內清談不能濟事，認為要做「洗滌社會、擁抱人民」的先鋒隊。他們相信走出學校的象牙塔，既能體會真實的社會，做「貧苦大眾的代言人」，也因此而獲得「靈魂的洗禮」（王復蘇 1972: 62）。

另外在 1973 年春，台大學生又發起以服務農、漁村、山地村落等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當時推動的學生宣稱：「一百萬小時的奉獻正足以使我們投身於現實生活，體驗現實生活之苦楚，接受現實生活之考驗，充實空虛的心靈，豎立生活的目標」（謝復生等 1979 [1973]: 886）。對這些反省批判流亡心態的戰後年輕知識份子而言，懷著愧疚而跨越社會階層界線的人道關懷，有如覺醒後所覓得的救贖之路。對他們來說，與校園及知識生活迥然不同的工、農等大眾經驗，是更為真實的社會現實。回歸現實，自然必須先理解這個比他們向來熟悉的世界更真實的部分。

（六）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與世代認同

保釣運動之後，覺悟啓蒙的戰後世代成員的言論與行動，以及社會政治革新的具體主張，基本上是一種溫和漸進傾向的改革主義。然而在其中卻有一項主張，亦即「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直接挑戰了國民黨威權統治核心的「法統」象徵與制度。這項政治改革主張，正與戰後世代的世代認同密切相關，是他們在覺醒中所形成對上一代的強烈不滿之典型代表。這項主張嚴重挑戰國民黨統治之象徵的與制度的基礎，結合了戰後世代的民主信仰與回歸現實理念。對於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因成員老化死亡等因素，而使原本法定人數不足的嚴重問題，至少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前的1971年春，已經可以看到公開的討論。當時外省籍的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系教授周道濟主張「本維護法統之精神，求不偏倚之計策」而「增補」一些年輕的新代表、新委員以解決問題（周道濟 1971a: 8）。³⁶又譬如前面提到的外省籍學者郭榮趙，在報刊文章中談到「青年人不能出頭必然引起不平」，直陳「現在中央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實在不能說已經達到理想符合實際的地步」。他批評道：

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二十多年前大陸人民選出的……；但是，在台灣一千四百萬人民，對他們卻不能發生多大的影響，因為其間既無政治關聯，也無法律關聯。因而對於政府的官吏和政策，談不到任何約束與監督。我以為二十年來，有些官吏儘管一般輿論反應不好，卻仍能我行我素，關鍵在此。因為他們並不必滿足人民，只要滿足少數人或一批人就好了。……

一個政黨不能僅僅只有一個領導階層，一個政權也不能單單只有一個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孤芳自賞。（郭榮趙 1971）

36 該文的增修版見周道濟(1971b, 1972)。

同年 10 月，《大學雜誌》社員聯名發表的〈國是諍言〉，以「我們都是在此地成長的一群青年（雖然彼此的省籍不盡同）」、「我們有權利來為自己的生存命運發言」的態度立論，如此批評：

二十幾年來，我們始終在維持一個龐大、衰老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雖然它在表面上維持了形式上的法統，而即使在形式上，它也完全無法代表那些在二十三年前未滿二十歲，也就是現年四十三歲以下的青年的一代，這些約佔我國現在人口三分之二的四十三歲以下的人民，從來也沒有獲得過投票選舉中央民意代表的機會。
(張景涵等 1971: 6)

他們因此提出比周道濟的增補辦法更激進的主張，要求中央民意代表必須定期改選、「徹底的變動」（張景涵等 1971: 3）。同一期《大學雜誌》上，也登載社長陳少廷的文章，認為中央民意代表最令人詬病的是已失去代表民意的功能，尤其是未能代表「今天社會的中堅份子——三、四十歲的壯年人」。他反對類似周道濟所提的增補選方案，呼籲「在自由地區及海外僑界辦理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對陳少廷來說，中央民意代表改選是全面政治革新「最基本同時也是最起碼的條件」，是其中「最首要，而且也是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陳少廷 1971: 13, 14）。在保釣運動之後、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前，要求中央民意代表退職以利新陳代謝的主張，在年輕一代知識份子中，已獲得相當普遍的支持。³⁷

就在《大學雜誌》刊出上述兩篇文章的同一個月底，台灣退出聯

37 譬如 1971 年暑期，救國團曾舉辦三、四年級大學生與研究生參加的「國家建設研究會」，其中第一期「國際事務研究會」一百多位學生在總結報告列舉的十條建議之一，即要求「提早實施中央民意代表機關的全面改選」（楊庸一、洪三雄 1972: 64）。另外，根據〈我們的呼籲〉一文連署人、當時就讀於政大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的陳陽德的記載，其中「經濟研究會」的課程中，一位學生發言主張中央民意代表自行退職並改選，「當他講完話後立刻獲得在場一百餘位同學熱烈的掌聲」。陳陽德認為這些熱烈掌聲代表「他道出了目前現階段青年的主要心聲」（陳陽德 1971: 35, 40）。

合國。之後的政治革新言論中，強化或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更成為熱烈討論的焦點。就像一位作者描述青年學生的動態時所說的，「一向沈默的人也開始講話……，過去不敢說的話大家開始說了。許多人已不在〔再〕責備聯合國，而是要求革新內政，發奮圖強。而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要求，更是迫切與激烈」（彥良 1971: 24）。11月中，台大《大學新聞》社論呼籲唯有中央民意代表改選，才能表示政府革新的決心，也才能使全民團結（楊庸一、洪三雄 1972: 64）。《台大法言》接著發表標題為〈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社論。一個月後再刊出〈重申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社論中，則直率地質疑說：「若謂中華『法統』繫乎此批人身上，吾人要問，是否這批年近七十的民意代表死亡後，中華法統也就隨之斷絕？」³⁸至於《大學新聞》的社論，更以責備上一代的嚴厲口吻，要求「當政者和中央民意機構代表們能夠以一千四百萬人民的自由為前提，重新深切地考慮自身的立場」；並認為「時局的緊迫已經不是以人民的血汗來維持少數人利益的時候了。『要革命者站出來，不革命者退下去！』這句話雖然無情，但卻代表了這一代青年的熱血」（台大大學新聞社 1972[?]: 27）。

就像前面提到的，從六〇到七〇年代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批評，其中外省籍者對國民黨統治的抨擊痛斥，經常不亞於本省籍者。當時激烈主張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者，許多就是外省籍年輕一代，譬如上述郭榮趙的言論即是。此外，台大代聯會主席王復蘇（見台大法言社 1979[1971]: 715, 716）與高準(1975a: 81)的主張，也是很好的例證。外省籍戰後世代對國民黨統治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激烈，一部份原因，是他們懷於上一代流亡的慘痛經驗。七〇年代初的時局，讓他們有深重的家國危機感。因此對有違民主、久踞權位的中央民意代表，更難以忍受。³⁹

38 《台大法言》的兩篇社論見洪三雄編(1973: 1-2, 5-6)，引文見其中第五頁。

39 1971年12月，陳少廷與周道濟就此問題在台大舉行公開辯論會，是這段期間對這個問題的不同主張者最受矚目的公開論爭。這場辯論紀錄見台大法言社(1972)。台灣退出

然而歷經七〇年代，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之類的政治改革主張，終究未曾實現。雖然上述 1971 年間學生與知識份子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言論如此熱烈，但是國民黨維持法統的意志未變。1972 年二月底召集的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五次會議，在三月中「全體一致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訂條文，既決議「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也維持原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依法行使職權」，只在「自由地區」辦理定期增補選，或由總統遴選海外僑民（國民大會秘書處 1972: 318-320）。接著在四月初，黨營《中央日報》連載六天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長文，以反對陳鼓應提倡的學生運動為主題，大力攻擊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以來積極要求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及其「偏激意見」（孤影 1976[1972]）。十二月初，台大另一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學生刊物社團「大學論壇社」舉辦兩次「民族主義座談會」。其中任教於哲學系的陳鼓應、王曉波發言強調中國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論及「將來中國的統一勝利」，於是被國民黨懷疑「有為匪統戰之嫌」。這導致 1973 年初警備總部逮捕、約談陳、王與同系學生錢永祥等（陳鼓應 1982a: 31）。這期間由於國民黨逐漸無法容忍，《大學雜誌》倍感壓力，同時因為成員之間日趨明顯的歧見與分裂，內部已有休刊之意（大學雜誌社 1973）。保釣運動後兩年以來戰後世代的革新言論，大致已趨於沈寂。1973 年春，台大哲學系開始受到人事「整頓」，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1974 年 7 月，陳、王等十幾位教師遭到解聘。這個事件代表國民黨對保釣運動以來以台大師生為主的政治社會革新言論與活動蓬勃發展的具體壓制。

然而革新言論的沈寂與國民黨的壓制，並不代表回歸現實世代的消失。相反地，從保釣與退出聯合國以來覺醒的戰後世代成員，從此逐漸更實際直接地參與社會政治改革。其中主要途徑之一，就是投入

聯合國後，各方討論強化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相當熱烈，不限於戰後世代之間，其過程可參見洪三雄（1993：第六章）。從退出聯合國到 1972 年三月的五個月左右期間，對這個問題的不同主張各方的討論文獻，見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1972）。

年輕一代本省籍的民意代表黃信介與康寧祥所領導、逐漸發展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另外，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批判「現代主義文學」、提倡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小說、重新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等回歸現實或「鄉土」的文化發展趨勢。覺醒的文化界年輕一代，正是這個文化潮流的主要推動者。在中國國族敘事架構下的鄉土歷史文化尋根，也因為七〇年代末國民黨對政治反對運動的持續高壓禁制而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這些後來的政治與文化轉折，繼續展現七〇年代做為晚近台灣歷史關鍵時期、而戰後世代為其核心世代的歷史過程。⁴⁰

六、結論

七〇年代初，經歷政治上重大傷痛事件而沈吟感嘆的年輕一代，終於覺醒奮起，反省批判戰後瀰漫於台灣社會的流亡心態，普遍體悟到回歸現實的重要性。他們將台灣的處境與自己這一代放到一個關於中國近百年來內亂外侮交替、追求強大自主的國族歷史故事情節中，理解自己與國族共同體的關係，領悟到自己這一代人在國族綿遠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歷史中之位置與責任。他們謳歌自己這一代與上一代的不同，熱望自由民主的制度與生活。在國民黨威權統治與壓制監控的恐怖氣氛中，他們在國族歷史敘事中的自我定位與期許，以及對自由民主的信仰，使他們不懼威脅，積極奮進地企圖理解社會現實，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然而橫跨整個七〇年代，國民黨當局持續的政治壓制與相當有限的變革，終究無法滿足戰後世代的改革期望。到了七〇年代末，三十幾歲就已擔任國大代表數年、政治立場上被視為「溫和派」的吳豐山，仍然如此慨嘆：

發達的教育，迅速地提高了人口的素質；高水準的國民，當

40 關於這些後續政治、文化發展與戰後世代的關係，見蕭阿勤(2000, 2002, 2003)。

然不會以溫飽為滿足；他們讀中國史書，一定會想到見賢思齊；他們讀歐西政黨政治理論，一定會想到中國的前途。

.....

尤其是國民生生不息，國族已由「上一代」進入了「下一代」。以廿三歲為通過完整系列教育的畢業年齡，則光復後出生的「小孩」，到今天為止，他們進入社會做事，已滿十年。若以民國卅九年為基準，則沒有見過戰亂烽火的新生一代，今年也將近卅歲了；卅年當然足夠讓一個人通過教育、結婚、生子的過程，並且成熟到可以開始認真地思考人生的方向，成熟到會在午夜夢迴時冷靜地自問：「我將何去何從？」（吳豐山 1978: 158）

如同 Robert Wohl 在其傑作 *The Generation of 1914* 一書中所說的，「歷史的世代並不是被生下來的；它們是被製造出來的。它們是人們藉之來概念化社會並試著改變它的一種機制」（Wohl 1979: 5）。或許我們也可以仿效 Edward P. Thompson 談論階級的方式說，世代是「一種歷史的現象」（a historical phenomena），亦即一個活動的過程，在其中主體能動與客觀環境條件同樣重要（Thompson 1966: 9）。鑲嵌在國族歷史敘事中的世代認同，使七〇年代初覺醒的戰後世代成員覓得清楚的自我定位與存在的意義。在覺悟啓蒙過程中，世代的概念並非自然浮現，而實為他們藉之理解自我、社會、與時代，並且企圖改變現狀的概念範疇。回歸現實精神與積極有所作為，使他們成為一個明顯推動當時與日後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自為世代之開端。他們具體的政治、文化主張雖非完全一致，但都出於對時代變局的反應；他們同倡回歸現實，則相當類似。七〇年代是戰後世代開始普遍積極投入公共事務的十年，他們在台灣戰後關鍵時期成為推動政治文化變遷的主要社會力量，是台灣七〇年代至今歷史的關鍵世代。

世代概念在社會學傳統中，至今未發展為有力的分析工具，尤其是 Mannheim 開啓的研究取向。西方社會學也一直直到最近，才逐漸重

新考慮世代做為重要的集體身分／認同現象，尤其是它與政治、文化變遷的關係。一些研究已指出，西方戰後世代的數量規模與其在社會中佔據策略位置，是二十世紀社會變遷的重要面向。這些研究並且探討在七〇年代成熟的戰後世代在改變當代世界的政治、社會、文化上之重要角色(Edmunds and Turner 2002b: 2)。從世代的角度分析戰後台灣歷史變遷，有利於我們發展歷史比較的視野。七〇年代之前，不少中、西文獻描述台灣的戰後世代，已經注意到他們個性消極順從、只專注於學業、追求個人成就、對社會政治事務相當冷漠等特徵，並指出台灣沒有類似六〇年代西方反抗既有體制的青年學生運動（參見註16）。然而從本文的觀點來看，台灣並非沒有戰後世代批判、反抗體制的現象，而是較西方的普遍現象晚了十年左右才出現。由於台灣特殊政治、文化形格勢禁的歷史條件，這種現象到七〇年代才發生。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推動社會政治改革與回歸現實、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戰後世代，包括 20 幾歲到 40 幾歲的成員，亦即涵蓋了比西方六〇年代青年學生運動份子更廣泛與更年長的成員。在台灣，戰後世代與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應該重視的是關鍵的七〇年代，而不是如眾多西方研究所專注的六〇年代。以世代的分析角度理解台灣戰後歷史的發展，試圖掌握歷史與傳記、結構與能動、自我與社會間的聯繫，這個充滿社會學想像的學術之旅，正待展開。

誌謝：本文為國科會九十一與九十二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91-2412-H-001-005, NSC92-2412-H-001-001），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演講（2003年12月6日）。謝謝研究助理冷翔雲與許懿萱協助文獻資料蒐集與文稿整理，也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台灣社會學》編委會的建議、主編謝國雄先生費心閱讀文稿與多所指正，以及編輯助理謝麗玲小姐的校閱糾謬。

參考文獻

- 大學雜誌社(1973)休刊乎！。大學雜誌 63: 1。
- 文榮光(1972)吾心有「戚戚」焉——「小市民」心聲讀後。見台大學生著，台大人的十字架，頁 222-225。台北：台大大學新聞社。
- 王壽(1968)青年氣質。中央日報 1968 年 3 月 10 日，第九版。
- 王杏慶(1971a)從一封信看青年人的覺醒。大學雜誌 47: 57。
- (1971b)譴責和呼籲。大學雜誌 48: 58。
- 王杏慶等(1971)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大學雜誌 47: 23。
- (1979[1971])我們的呼籲。見丘為君等編，台灣學生運動 1949-1979 (下)，頁 843-846。台北：龍田。
- 王甫昌(1997)結構限制、運動參與、與異議性意識：台灣民衆政黨支持的社會結構基礎初探。見張苙雲等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冊)，頁 249-294。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王洪鈞(1957)精神上的低氣壓。文星 1(1): 24。
- (1961)如何使青年接上這一棒。自由青年 25(7): 7。
- (1963[?])葡萄藤和大砲。見王洪鈞著，生於憂患，頁 13-17。台北：文星。
- 王高(1970)垂手聽訓。大學雜誌 36: 1。
- 王振寰(1989)台灣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1): 71-116。
- 王斯德、錢洪主編(1989)世界當代史參考資料：1945-198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王復蘇(1973[1971])大學生的曙光。見洪三雄編，知識人的出路，頁 132-134。彰化：新生。
- (1972)台大社會服務團成立始末。大學雜誌 49: 62-63。
- (1990[?])無語。見王復蘇著，傳鐘下的沈思，頁 63-64。台北：懋聯。
- 王渡(2002)馬英九現象。台北：普天。
- 王曉波(1969)責任與信心——談留學問題。大學雜誌 20: 14-15。
- (1979)代序——七十年代自我思想的回顧與反省。見王曉波，時代呼聲，頁 1-20。台中：藍燈文化。
- 卡爾(1973[1971])意識改造——由王杏慶的選擇談到當前歷史的覺悟。見洪三雄編，知識人的出路，頁 47-49。彰化：新生。
- 台大大學新聞社(1972[?])自由與責任——談學校的審稿制度。見台大大學新聞社編，台大人的十字架，頁 21-22。台北：台大大學新聞社。

- (1972[?])b「革新」從「革心」做起。見台大大學新聞社編，台大人的十字架，頁 29-31。台北：台大大學新聞社。
- (1972[?])c良心的自覺。見台大大學新聞社編，台大人的十字架，頁 25-28。台北：台大大學新聞社。
- 台大法言社(1972)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辯論。大學雜誌 49: 80-89。
- (1979[1971])支持全面改選的青年心聲。見丘為君等編，台灣學生運動 1949-1979 (下)，頁 714-717。台北：龍田。
- 包青天(包奕洪)、張景涵(張俊宏)、張紹文、許仁真(許信良)(1971a)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上)。大學雜誌 43: 32-35。
- (1971b)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中)。大學雜誌 44: 14-19。
- 丘為君等編(1979)台灣學生運動 1949-1979 (中)。台北：龍田。
- 朱全斌(1998)由年齡、族群等變項看台灣民衆的國家及文化認同。新聞學研究 56: 35-63。
- 朱雲漢(1977)歷史、世局與國運。仙人掌雜誌 9: 181-189。
- (1980[1979])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一代——知識青年與中國未來。見周陽山編，知識份子與中國，頁 423-427。台北：時報。
- 呂俊甫(1969)從大學教育談到人才外流和留學政策——兼論今日國人的「自貶」心理和美國文化的影響。大學雜誌 16: 3-5。
- 何文振(1971)給知識份子的邀請書。大學雜誌 47: 25。
- 何秀煌(1970)政風、教育與留學生。大學雜誌 25: 15-17。
- 宋國誠(1978)理性的批評，誠懇的呼籲——宋序。見宋國誠、黃宗文編，新生代的吶喊，頁 1-4。台北：編者自印。
- 李少儀、陳景安(1972)學生的權利與義務。大學雜誌 53: 57-61, 70。
- 李祥枚(1968)霧非霧。中央日報 1968年2月8日，第九版。
- 李敖(1961)老年人和棒子。文星 49: 5-9。
- (1963)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 63: 7-12。
- 李筱峰(1987)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李學叡(1970)打幾針強心劑。大學雜誌 26: 1。
- 杜維明(1968)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大學雜誌 3: 5-7。
- 吳乃德(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形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 3: 53-85。
- 吳國棟(1979[?])五·二十青年自覺運動。見丘為君等編，台灣學生運動 1949-1979 (上)，頁 35-48。台北：龍田。
- 吳豐山(1978)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台北：遠景。

- 周道濟(1971a)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東方雜誌復刊 4(11): 7-10。
- (1971b)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天聲雜誌 1(3): 2-7。
- (1972)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見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當前國是言論集，頁 141-152。台北：廬山。
- 林本山(1969)介紹不甘於被遺棄的一群。大學雜誌 22: 25。
- 金耀基(1969)孤獨的一群——談在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大學雜誌 20: 5-6。
- 若林正丈(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洪金珠、許佩賢譯。台北：月旦。
- 茅漢（王曉波）(1971)六一七學生示威紀實。大學雜誌 43:24-27。
- 南方朔（王杏慶）(1978)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四）。夏潮 4(6): 44-47。
- (1979)序——撥開秘思之網。見陳國祥著，青年呼聲，頁 1-7。台北：四季。
- 胡晴羽(1977)掙出一條嶄新的路。見賴志明編，誰來經理中國，頁 55-57。台北：香草山。
- 孤影(1976[1972])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見孤影著，對年輕人的真心話，頁 1-68。台北：中央日報社。
- 厚道夫(1972)出國主義。見台大學生著，台大人的十字架，頁 79-85。台北：台大大學新聞社。
- 彥良(1971)與友談國事——用人、黨提名與政治革新。大學雜誌 47: 26。
- 洪三雄(1973[1971])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見洪三雄編，知識人的出路，頁 135-136。彰化：新生。
- (1973)寫在前面。見洪三雄編，知識人的出路，頁 3-6。彰化：新生。
- 編(1973)知識人的出路。彰化：新生。
- (1993)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台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晚報。
- 高準(1975a)台灣權力矛盾及其解決之道——獻給所有在台灣關心國是的同胞（一）。明報月刊 10(1): 8-83。
- (1975b)台灣權力矛盾及其解決之道——獻給所有在台灣關心國是的同胞（三）。明報月刊 10(4): 29-34。
- (1978)文學與社會改造。台南：德華。
- 朗星(1972)興趣和天才的衰落。見台大學生著，台大人的十字架，頁 60-63。台北：台大大學新聞社。
- 凌淑如(1977[1975])不懂流淚的一代。見賴志明編，誰來經理中國，頁 13-24。台北：香草山。
- 郭榮趙(1971/9/16)一個歷史工作者對時局的反省。聯合報。
- 殷穎(1979[?])由美國留華學生所點燃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見丘為君等編，台灣

- 學生運動 1949-1979 (中), 頁 361-366。台北: 龍田。
- 馬英九(1982[1981])留學生的十字架。見波士頓通訊編輯委員會編, 留學生的十字架, 頁 353-358。台北: 時報。
- 孫震(1972)我看「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見楊國樞等著, 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評「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頁 38-41。台北: 環宇。
- 游美惠(2000)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 8: 5-42。
- 徐復觀(1971[1968])有關台灣的留學政策問題。見徐復觀著, 徐復觀文錄(一)文化, 頁 182-185。台北: 環宇。
- 尉天驄(1978)西化的文學。見丘為君、陳連順編, 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 頁 155-166。台北: 龍田。
- 國民大會秘書處(1972)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實錄。台北: 國民大會秘書處。
- 康寧祥(1977)我看張俊宏。見張俊宏, 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 頁 8-10。台北: 作者自印。
- 程放(1973[1972]a)建國優先論。見洪三雄編, 知識人的出路, 頁 59-60。彰化: 新生。
- (1973[1972]b)民主至上說。見洪三雄編, 知識人的出路, 頁 61-62。彰化: 新生。
- 湯鳳娥(1978)勸我的丈夫留在書房。見陳鼓應著, 容忍與了解, 頁 195-201。台北: 百傑。
- 葉芸芸(2000)編輯報告。見葉芸芸主編, 葉榮鐘全集, 頁 11-16。台北: 晨星。
- 葉洪生(1968)這一代的方向——讀「覆霄霄」有感。中央日報 1968年1月26日, 第九版。
- (1971)廿年一覺飄花夢——從一個年輕人的時代感受談起。大學雜誌 47: 34-43。
- (1976[1972])自序。見葉洪生著, 這一代的方向, 頁 1-4。台北: 環宇。
- 葉廣海(1968/2/23)收起沒有根的憤怒。中央日報, 第九版。
- 盛杏媛(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 一九九〇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 9(1): 41-80。
- 陳少廷(1968)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大學雜誌 1: 4-5。
- (1971)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大學雜誌 46: 13-16。
- (1973)陳序。見洪三雄編, 知識人的出路, 頁 1-2。彰化: 新生。
- 陳文俊(1983)台灣地區中學生的政治態度及其形成因素——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

- 台北：財團法人資教中心。
- (1994)台灣大學生的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中山社會科學學報 8(2): 41-91。
- (1997)政治社會化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大（專）學生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之研究。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1998)台灣地區學生的政治文化：中、大學生的政治態度與台灣民主化的前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 1(3): 23-60。
- 陳明哲(1973[1972])我們需要起變的精神。見洪三雄編，知識人的出路，頁 73-75。彰化：新生。
- 陳映真(1978)從「西化文學」到「鄉土文學」。見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頁 172-178。台北：龍田。
- 陳國祥(1979)青年呼聲。台北：四季。
-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 7: 108-139。
- 陳陽德(1971)現階段青年傾向之分析——對暑期國家建設研究員的反應之調查及分析。大學雜誌 46: 35-41。
- 陳義彥(1978)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 (1991)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國科會。
- 陳鼓應(1971)容忍與了解。大學雜誌 37: 6-7。
- (1972[1971])開放學生運動。大學雜誌 49: 64-68。
- (1972)再論「學生運動」。大學雜誌 53: 65-70。
- (1978[1971])說話是一種天賦的權利（序）。見其，容忍與了解，頁 1-4。台北：百傑。
- (1982a)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上）。中報月刊 28: 27-35。
- (1982b)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中）。中報月刊 29: 25-33。
- (1982c)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下）。中報月刊 30: 33-38。
- 陳漳生(1971)今日知識青年之處境。大學雜誌 46: 32-34。
- 陳曉林(1968)覆霄霄——談年輕人的問題。中央日報 1968 年 1 月 17、18 日，第九版。
- 張茂桂、蕭新煌(1987)大學生的「中國結」與「台灣結」——自我認定與通婚觀念的分析。中國論壇 25(1): 34-52。
- 張宏遠(1971)說幾句內心的話。大學雜誌 47: 17-19。
- 張系國(1968)知識份子的孤獨與孤獨的知識份子。大學雜誌 6: 14-15。
- (1969)談留學生。大學雜誌 20: 11。

- (1984[?])談寫實主義。見張系國著，讓未來等一等吧，頁 89-109。台北：洪範。
- 張俊宏(1977)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台北：作者自印。
- 張景涵（張俊宏）(1969)大學生調查報告，討論與建議——大學生對學校的態度。大學雜誌 24: 24-26。
- (1975)變局裡該怎麼辦？。台灣政論 1: 8-13。
- 張景涵（張俊宏）等(1971)國事諍言。大學雜誌 46: 1-10。
- 黃宗文(1978)一聲宏亮的吶喊——黃序。見宋國誠、黃宗文編，新生代的吶喊，頁 5-8。台北：編者自印。
- 黃德福(1995)選舉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見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編，民主政治的發展與成就，頁 1-33。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
- 楊青矗 (1977) 國內工人現狀分析。夏潮 2(6): 39-42。
- 楊國樞(1972)信任與尊重我們的青年——與友人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之一。見楊國樞等著，偏安心態與中興心態——評「一個小市民的心聲」，頁 1-17。台北：環宇。
- 楊庸一、洪三雄(1972)民意何在？——評中央日報的一篇文章。見洪三雄編，知識人的出路，頁 63-66。彰化：新生。
- 劉大任(1970)留學生的思想框架。大學雜誌 25: 39-41。
- 劉容傑(1969)給新鮮人們的建議。大學雜誌 22: 23-24。
- 劉義周(1993)台灣的政治世代。政治學報 21: 99-120。
- (1994)台灣選民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 1(1): 53-73。
- 謝復生等(1979 [1973])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的奉獻。見丘為君等編，台灣學生運動 1949-1979（下），頁 884-891。台北：龍田。
- 蕭阿勤(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台灣史研究 6(2): 77-138。
- (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台灣史研究 9(1): 181-239。
- (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 5: 195-250。
- 蕭揚基(2002)台灣地區高中學生國家認同及其相關因素。公民訓育學報 11: 67-108。
- 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1972)當前國是討論集。台北：廬山。
- Altbach, Philip G. and Robert S. Laufer, eds. (1972) *The New Pilgrims: Youth Protest in Transition*. New York: David Mckay.

- Andrews, Molly (2002)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Dialogue,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Pp.75-87 in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une Edmunds and Bryan S. Turn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Appleton, Sheldon (1970)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on Taiwan: A Survey of Student Attitudes. *The China Quarterly* 44: 38-65.
- (1973) Regime Support among Taiwan High School Students. *Asian Survey* 13: 750-760.
- Barker, Chris and Dariusz Galasiński (2001)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 Braungart, Richard G. (1984) Historical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 Units: A Global Pattern of Youth Mov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2: 113-135.
- Chen, Guuying (陳鼓應) (1982) The Reform Movement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ince 197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4(3): 32-47.
- Edmunds, June and Bryan S. Turner (2002a) *Generations, Culture and Society*.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2002b) Introduction: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nd Politics. Pp. 1-12 in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une Edmunds and Bryan S. Turn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Elder, Glen H., Jr.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yerman, Ron (2002)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Outline of a Generational Approach. Pp. 51-74 in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une Edmunds and Bryan S. Turn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Fairclough, Norma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 Gates, Hill (1992) Small Fortunes: Class and Society in Taiwan. Pp.169-185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is F.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Armonk, N.Y.: M. E. Sharpe.
- Giele, Janet Z. and Glen H. Elder Jr., eds. (1998)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 M.E. Sharpe.
- Hardy, Melissa A. and Linda Waite (1997) Doing Time: Reconciling Biography with

-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Pp. 1-21 in *Studying Aging and Social Chang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edited by Melissa A. Hard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inchman, Lewis P. and Sandra K. Hinchman (1997) Introduction. Pp. xiii-xxxii in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ood, Steven J. (1997)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Huang, Mab (1976) *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Taiwan, 1971-1973*.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Hughes, Christopher (1997)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Israel, John (1963) Politics on Formosa. *The China Quarterly* (15): 3-11.
- Kedourie, Elie (1993[1960]) *Nationalism*. Oxford, UK: Blackwell.
- Kertzer, David I. (1983) Generation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125-149.
- Laufer, Robert S. and Bengtson Vern L. (1974) Generations, Aging,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onal Uni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0 (3): 181-205.
- Liu, I-chou (劉義周) (1979) Political Support and Voting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Colleg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41: 37-44.
- Mannheim, Karl (1952 [1927])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Pp. 276-320 in hi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arsh, Robert M. (1996)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Social Change in Taipei, Taiwan Since the 1960s*. Armonk, N.Y.: M.E. Sharpe.
- Mei, Wen-Li (1963) The Intellectuals on Formosa. *The China Quarterly* 15: 65-74.
- Meyer, Michael (2001) Between Theory, Method, and Politics: Positioning of the Approaches to CDA. Pp. 14-31 in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ted by Ruth Wodak and Michael Meyer. London: Sage.
- Philips, Louise and Marianne W. Jørgensen (2002).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 Pilcher, J. (1994) Mannheim's Sociology of Gener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5(3): 481-95.

- Riley, Matilda White, Marilyn Johnson, and Anne Foner, eds. (1972) *Aging and Society. Vol. 3: A Sociology of Age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Ringmar, Eric (1996)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861.
- Scott, Jacqueline (2000) Is It a Different World to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Generational Effects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Child-rearing Valu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2): 335-376.
-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p. 37-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UK: Blackwell.
- Tannenbaum, E. R. (1976) *1900: The Generation Before the Great War*. Garden City: Anchor Press.
- Thompson, Edward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Tien, Hung-mao (1993[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Turner, Bryan S. (1998) Outline of a Theory of Gener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1): 91-106.
- (1999) *Classical Sociology*. London: Sage.
- (2002) Strategic Generations: Historical Change, Literary Expression,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Pp.13-29 in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une Edmunds and Bryan S. Turn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Whitebrook, Maureen (2001) *Identity, Narrativ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Wohl, Robert (1979)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 Linda A. and Rolf O. Kroger (2000)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for Studying Action in Talk and Tex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yatt, David (1993) *Out of the Sixties: Storytelling and the Vietnam Gen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生活雖有幕後／幕前，自我難分生命／故事

蕭阿勤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生命有意義嗎？主編謝國雄教授既然提議本刊作者進行幕後告白，談談論文研究對個人生命的意義，因此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告白的提議，也探問作者的終極關懷。這無疑認為生命有意義，是因為它可以（或應該）朝著一個清楚的終極目標前進；因為有這個終極關懷，我們才知所進退，覓得生命力量的泉源，不會虛無頹唐。這個關懷是觀照自我生命的制高點，讓我們知道生活中哪些事物有意義，必須奮力搏取，而其他雖無可逃避，也必須一笑置之。這些看法同時傳達的訊息是：因為有一個判準或目標，我們才能將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視為一個整體來評價，也才能評估它所經歷或從事的種種，相對於這個整體，其地位與作用何在。也因為如此，其他作者與我，才能回答幕後告白的另一個提問，亦即個人論文研究在學衛生涯中的位置。

主編希望我與其他作者告白的，不就是那些我們熟悉而動人的故事的基本要素嗎？一個有意志、企圖、情感的行動者，從起初或平靜的狀態開始，遭遇艱難或品嚐歡樂，有酸甜也有苦辣，其中需要努力與克服，或許也有偶然與機運。這些構成故事轉折起伏的情節，從開頭，到中間，至結尾。更重要的是，認真的聽眾從一開始就會不斷在心中盤問：這故事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好故事必須有主軸、有 telos，否則我們無法判斷那些情節要素是否必要與合理，也抓不到整個故事的重點，不知道說故事者要傳達什麼。

幕後告白的提問，無疑假設論文作者們的個人生命與學衛生涯，都有一個潛在的故事。時間的洪流滔滔，我們所處的「現在」瞬間褪為「過去」，而「未來」隨時迎面撲至。這些提問與假設，反映極普遍的文化現象：我們用故事，或者說敘事，來釐清個人（或集體）生命在時間之流中，從何處來，置身何處，往何處去。故事幫助我們理解生命的意義，向自己與別人呈現我們是誰，透露我們的榮耀與恥辱、遐思與渴望、哀愁與耽溺等。敘事與認同建構，難分難解，一而二，二而一，這正是我的論文所涉及的「敘事認同」理論的基本洞見。

現在，我必須說故事了。不過生命與虛構的故事畢竟不同，後者

可以創造人物及其生活，但我們屬於時代與社會，無法隨意創造自己的生命，只能試圖理清自己的故事，成為其中的主角。故事從八〇年代前半期的高雄開始，那是我度過青春末期、成年早期，形成個人往後世界觀的地方。前不久，我剛重遊舊地。入夜的鹽埕區，大仁路上商家的燈光已零落，三山國王廟前的野台戲兼雜豔舞。我以往流連的大舞台戲院已歇業，大小停車佔滿那破敗的門廊。第三信用合作社前的長廊，只剩一個雜誌攤。寒淡的日光燈下，擺滿誘人的肉體。二十年前，攤攤相連，那裡堆積的卻是五顏六色的黨外雜誌。當時的我，駐足忘返。這個社會的秘密，從那裡解開。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從那裡轉變。世界正交戰，戰鼓聲咚咚，彷彿在召喚。

於是我起身，尋找那鼓聲來源。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不請自來，陪我上路。故事主人翁的曲折旅程展開，從高雄到台北，台北至美國，美國而台北，繼續跋涉。雖然鹽埕區的燈火已黯淡，但鼓聲至今未歇，時而隱約沒去，由近而遠，時而轟隆傳來，由遠至近。是那有著無可名狀的魔力，而使人必須起身應答的鼓聲，使主人翁一路尋去，旅程未了。那鼓聲催人，時時逼問你從何處來，欲往何處去。從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研究，到七〇年代戰後世代、歷史敘事、與文化政治變遷探討，猶如主人翁沿途發出的邀請，邀請同行，一起探索：我們從何處來，欲往何處去。

這樣的研究對台灣社會有何意義？沒有八〇年代的政治社會騷動，我不會受到社會學的吸收。沒有幼年時在鄉間四處輾轉謀生的經驗，不會讓我渴望了解這塊土地的過去。對七〇、八〇年代的歷史取向研究，帶我回到自己的成長期。探討那些政治與文化人士的歷史敘事、認同與行動，既在澄清這個社會的故事，也在爬梳自己與它的歷史關連。這些研究，讓我的生命故事與這個社會的故事聯繫起來。幼年鄉間的記憶，八〇年代的鼓聲，仍是激發社會學想像的靈光。

我們對生活或生命歷程的體驗理解，本身就具有敘事的性質，故事內在於這些體驗理解。這涉及時間之流中，人們的行動、自我理解、與社會過程的本體性質。生活縱使有幕前、幕後之分，但除非知識追求與生命經驗能共同構成一個首尾協調的故事，否則我們難以建立自我認同，一切的意義將隱晦難尋。生命與故事難分難解，沒有生命，何來故事？沒有故事，生命豈有寄託？個人如此，集體亦然。